

本期导读

本刊编辑部

编史修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文化传统。“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在我国几千年的文明史中,史志发挥着“存史、资政、教化”的重要作用。连云港具有丰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历代先贤为我们留下了大量的方志文献,积淀形成了特色鲜明、影响深远的地方文化。继承和弘扬这一优良传统,做好当代志鉴编纂工作,是我们的光荣使命,也是我们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在日前召开的全市地方志工作会议上,吴海云副市长出席会议并作题为《为时代树碑 为人民立传》的重要讲话,全市各县区、机关各部门从事志鉴工作的同志要深入贯彻落实吴海云副市长重要讲话精神,为时代、为人民编修精品良志,全面推进全市史志工作健康发展。详见《为时代树碑 为人民立传——在全市地方志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高度重视党的自身建设,以“永不动摇信仰、永不脱离群众”为目标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是党中央加强新形势下党的自身建设的一项重要举措。当前,第二批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如火如荼。每一位党员干部,应当与党中央保持一致,积极投入到教育实践活动。党史部门的党员干部如何践行群众路线?《以史鉴今 传递正能量 资政育人助推新发展》一文从坚定理想信念,坚守党史工作者正确的世界观、方法论,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做一名合格的党员干部,认真履行史志工作职责,立足本职、努力成为史志工作的专家、学者和组织者等五个方面进行了深入地阐述。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毛泽东、邓小平作为我们党第一代、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心中时刻装着人民群众,一生坚持党的群众路线。今年是邓小平同志诞辰 110 周年,研读《邓小平文选》,到处闪耀着邓小平关于党的群众路线的理论

和实践光辉,他对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的丰富发展和发扬光大,贡献不可磨灭,意义十分深远。韩翠林的《邓小平关于群众路线的理论和实践举隅》一文从“党离不开人民,人民也离不开党”阐释了党和人民群众血肉关系的重要性;“党的全部任务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概括了党的群众观和党的根本宗旨的一致性;“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论述了贯彻群众路线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必要性等方面论述了学习《邓小平文选》的体会。

今江苏省赣榆县西部的班庄镇古城村,南傍石梁河水库与东海县相毗邻,西濒凉泉水河与山东省临沭县隔河相望。全村现有人口 4200 人,为目前全县大村之一,因村西北角有一座古城遗址而得名。现在大多认为此城址为周朝祝其国与两汉时代祝其县故城旧址,但有的学者认为祝其故城在今赣榆县西北的夹谷山附近,两地虽均在赣榆县境内,但南北却相距约 15 里。同时,古今学者,又围绕祝其之名的由来,齐鲁会盟于祝其之夹谷山等问题争议分歧很大。还原这段历史,澄清这些历史疑案,对于弘扬地方古文化,打造地方人文名片,文明兴县乃至文明兴市无疑具有重要意义。详见《祝其国与祝其县溯源》。

照相业进入中国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据《新浦区志》记载,民国五年(1916 年)安徽人夏少明来到新浦,在紧挨大街的新市街南侧(今第一池斜对面)租房开设照相馆,起名“夏昶兴照相馆”,开了新浦乃至海属地区照相业之先河。照相业兴起,至今已近百年。百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发展,新浦照相业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从改革开放之初的 120、135 黑白、彩色胶片相机,发展至目前的数码、单反等现代化数码电子装备进入千家万户,照相业百年的发展,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经济的发展及社会文明的进步。详情请参阅韩世泳先生撰写的《百年新浦照相业》。

1



目



P10 2013年9月在中哈元首共同见证下,连云港市政府与哈萨克斯坦国有铁路股份公司正式签订项目协议



P25 1942年,肖华在西朱范村学习整风文件



P27 赣榆古城遗址



P45 富美照相馆

特 载

04 为时代树碑 为人民立传

——在全市地方志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摘要)

/ 吴海云

06 以二轮修志工作为中心全面提升地方志工作水平

——在全市地方志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 苏中保

历史与发展

09 关于江苏沿海开发向纵深推进的调查与思考(下)

——以连云港为例 / 胡宝明 蔡立志 刘成文

12 实现东方大港梦的导航人(2)

——深切回忆谷牧同志与连云港港口建设工作

/ 赵 泳

群众路线专栏

15 以史鉴今传递正能量 资政育人助推新发展

/ 连苏文

18 邓小平关于群众路线的理论和实践举隅

——学习《邓小平文选》的几点体会

/ 韩翠林

21 党的群众路线发展脉络综述

/ 赵维娜

24 东海县西朱范村

——山东整风运动的发始地

/ 王晓华

郁洲溯源

27 祝其国与祝其县溯源

/ 孙 铭



录

31 史迹斑斓大义村——寻古云台十八村之二

/ 伏广喜 张茂田

34 寻找消失的许家大院(下)

/ 许重瑾

史海钩沉

38 唐宋时期的吕氏家族与海州

/ 陈贵洲

41 晚清淮盐成功自贻——兼论淮北盐区清末民初的发展

/ 胡可明

44 百年新浦照相业

/ 韩世泳

风物览胜

47 连云港红色地名

/ 王 滨

封二:史志掠影

封三:石上墨韵

——连云港石刻拓片精选

本刊启事

1. 本刊发表的署名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文责自负,不代表编辑部意见。
2. 本刊对来稿有编辑修改权。
3. 本刊严禁一稿多投,来稿不退,3个月内未接到本刊通知的,作者可自行处理。

《连云港史志》编委会

顾 问:(以姓氏笔画排列)

古龙高 江行洲 刘畅征
许燕鎏 杨春生 李洪甫
张学贤 张良群 彭 云
韩世泳

主 任:苏中保

副 主 任:张 斌 赵廷旗 陆瑞萍

委 员:(以姓氏笔画排列)

王忠新 王 滨 刘 鹏
邱仕明 何洪斌 姜龙才
郝 芳 董恕志 韩翠林

主 编:苏中保

副 主 编:张 斌 赵廷旗 陆瑞萍

责任编辑:邱仕明 张伟敏

文字总校:张俊鹏

2014 年第 2 期总第 92 期

(内部资料 赠阅交流)

纵览历史借古鉴今
展现风貌追溯渊源
立足港城洞开窗口
围绕中心服务大局

地 址:连云港市新浦区朝阳东路 69 号

邮 编:222006

网 址:www.lygsz.gov.cn

电子邮箱:Lygshitan@163.com

电 话:(0518)85825137 85821368

印 刷:连云港市百草园教育印刷有限公司

准印证号:苏新出准印 JS—G033 号

出版日期:2014 年 4 月



为时代树碑 为人民立传

——在全市地方志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摘要)

(2014年3月10日)

吴海云



吴海云副市长

编史修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文化传统。“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在我国几千年的文明史中,史志发挥着“存史、资政、教化”的重要作用。地方志全面系统地记述了一个地区的经济社会历史与现状,是传承和彰显地域文明的重要载体,是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瑰宝。连云港具有丰厚的历史文化底蕴,

历代先贤为我们留下了大量的方志文献,积淀形成了特色鲜明、影响深远的地方文化。继承和弘扬这一优良传统,做好当代志鉴编纂工作,是我们的光荣使命,也是我们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

编史修志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从1984—2005年,第二轮修志跨越的这20多年时间里,我



市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辉煌成果,城乡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综合实力大幅提高、城乡面貌日新月异、人民生活显著改善、社会更加文明和谐。在推进经济社会加快发展的过程中,各项工作都有很多经验教训、成败得失,尊重历史,尊重科学,真实地记录、反映时代脉搏,可以为后世留下我们这一代创业者的真实足迹,为今后的工作提供借鉴。

编史修志是文化发展繁荣的重要支撑。志书是一个地方历史文化的翔实记述,可以再现本地的自然风情、发展成就、灿烂文化、淳朴民风、杰出人物等,能够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热爱家乡、建设家乡的自豪感。通过编史修志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通过事例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既是传承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也为建设文化名市提供了思想保障。

明确职责分工,加快第二轮修志步伐。当前要按照省政府统一要求,进一步确定市、县区志书各阶段任务完成的时间表,做到任务明确、责任到人。由于修志工作时间跨度长、资料查找难度大、编写任务繁重,各单位要明确一名分管领导,安排专人、专项经费开展编写工作,人手紧张的单位可返聘熟悉情况的老同志进行编写,同时提供必要的办公条件和经费;提交初稿但未达到要求、未通过评审的单位要落实专人进行修改,资料欠缺较多的可通过召开离退休老同志座谈会、到档案馆查找资料、走访知情者等途径解决。市志要尽快推进分纂,启动总纂。各县区要在市地方志办的指导下,加快编修步伐。同时,市年鉴作为综合性、权威性的大型工具书,历来受到各级领导和社会各界的重视,希望大家按照规范运作、精益求精的要求抓紧落实。地方志工作涉及部门多、行业多、学科多,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各有关单位要按照全市统一部署要求,把做好地方志工作作为义不容辞的责任,结合编修行业志,确保按时完成所承担的修志任务。市地方志办公室作为牵头部门,要主动加强组织协调,认真听取其他部门的意见和建议,加大业务指导力度。各县区地方志办要切实担负起组织实施本地地方志工作的责任。编纂地方志是一项专业学问,加强修志队伍建设,选配好地方志机构领导班子,努力培养高素质修志人才,是地方志事业发展的重要保证。各级各部门各单位要把队伍建设摆在

重要位置,根据工作需要,聘请文字水平高、身体好、熟悉情况的离退休人员参加修志,吸收热心地方志工作的专家学者,充实年轻业务骨干,形成“老中青”三结合的结构。广大修志工作者要发扬淡泊名利、乐于奉献的精神,兢兢业业、埋头苦干。要采取多种形式,加强修志人员培训,不断提高队伍素质。

高标准高质量完成志书编修。地方志工作是为时代树碑,为人民立传,是一项神圣严肃的工作,地方志法规政策为确保质量都作了具体规定,要树立质量第一的原则,不能把地方志等同于一般性书籍和出版物,要始终坚持科学严谨、实事求是的工作态度,紧密结合我市的地方特色、时代特色和产业特色,广泛深入地开展调查,全面掌握翔实可靠的市情资料。在此基础上,坚持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对材料进行认真细致的鉴别考证,对每一个历史事实、每一个数据,都要审核无误,把好政治关、保密关和重大史实关,严格执行志书质量标准和审定验收制度,确保入志资料翔实准确、层次分明、取舍精当,真正起到“资治、教化、存史”的作用。

加强地方志编撰工作的组织领导。二轮修志是省政府下达的指令性任务,是我市近两年地方志工作的重要任务,也是一项必须严肃对待、认真完成的政治任务。各地要把地方志事业发展纳入年度重要工作,摆上重要议事日程,切实做到年初有部署、年中有检查、年末有考核,形成地方志事业与其他各项社会事业协调发展的良好机制。要切实把工作经费列入财政预算,保证编纂工作的合理需要,着力改变因经费原因而制约影响工作开展的现象。要坚持行政区域内的任何单位都有提供资料的义务,保证资料的广泛征集。各地、各部门、各单位的分管负责同志要切实负起责任,狠抓工作,不要輕易地变动人员,便于上下协调,要多关心支持地方志事业发展,定期听取工作汇报,加强调研和指导,主动帮助解决工作中遇到的实际困难和问题,确保圆满完成第二轮修志工作任务。



以二轮修志工作为中心 全面提升地方志工作水平

——在全市地方志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2014年3月10日)

苏中保

一、二轮修志工作及年鉴工作回顾

在省政府的统一安排下,我市于2005年启动第二轮地方志编修工作。全市以编修1部市志、8部县区志(包含市开发区)以及一批行业志和部门志为目标,全面开展二轮修志工作。几年来,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按照国务院《地方志工作条例》和《江苏省实施〈地方志工作条例〉办法》要求,经过全市史志工作者和各承编单位的辛勤努力,二轮修志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一是《连云港市志》编修完成60%。截至目前,《连云港市志》已征集2亿多字的文字资料,承担《连云港市志》编修任务的各县区及市相关单位共计126家(不含由牵头单位负责的57家单位),其中,96%的承编单位提交了初稿,市卫生局、检察院、建设局、旅游局、财政局、国税局、文广新局等54家单位率先完成了评审、验收,市志43个编目中,卫生、旅游、财政·税务、花果山、文化、环境等60%的编目完成了分纂。

二是县区志编修工作稳步推进。《连云区志》

《海州区志》《新浦区新志》完成了终审验收,即将出版;《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志》完成了终审。

三是出版了一批地情资料。几年来,我们指导部分有条件、热心于地方志事业的单位、乡镇、部门编纂了《连云港方志志》《连云港饮食文化》《东辛农场志》《云台农场志》《大伊山志》《白塔埠镇志》《连云港国税志》《连云港市工会志》等一批地情资料和山水志、乡镇志、行业志、部门志,并已出版发行。

四是《连云港年鉴》出版15卷。随着二轮修志工作的推进,全市综合年鉴的编纂水平也在不断提升。《连云港年鉴》自1999年开始编纂,一年一卷,到去年已公开出版15卷。各县区均拥有自己的综合年鉴。多年来,年鉴工作得到各级政府和各部门的高度重视,各单位普遍安排文字功底好、思路开阔、责任心强的同志负责撰稿工作,全面、真实、客观地记载了全市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发展等方面的重大事件和主要活动,使最能突出时代特色、最能体现各行各业建设成就、最能凸显连云港市地方特点的内容在年鉴中得到充分反映,市年鉴和县



区年鉴在全国和全省年鉴评比中多次获奖。这些成绩的取得与各级政府、各部门、各位年鉴撰稿人的大力支持密不可分,在这里,我代表市地方志办公室向同志们致以诚挚的谢意!

二、当前修志工作面临的形势

一是时间紧,任务重。省政府要求各市于2015年全面完成二轮修志任务,并且要求县区志在市志之前完成出版。目前,苏南、苏中地区的县区志和市志编修工作进展较快,《邗江县志》、《高淳县志》、《江阴市志》、《钟楼区志》等多部县区志已出版发行,而我市区县志中还没有一部完成出版,四部县志中还没有一部完成总纂或终审。从工作量上分析,《东海县志》完成总纂70%,《赣榆县志》和《灌南县志》完成总纂50%,《灌云县志》完成初稿编写80%,这四部县志距公开出版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从市级层面上看,扬州、镇江、无锡、苏州等市志或已进入印刷阶段,或已完成终审,而《连云港市志》的初稿尚未收齐,还谈不上总纂。在126家承编单位中,还有初稿未评(主体资料基本具备)46家,初稿修改(主体资料欠缺较多,需进一步补充)21家,未提交初稿(包括仅提交大事记)5家,接下来还有总纂、终审、验收、出版、印刷等一系列工作,完成所有这些最快也要两年时间。因此,我市要在2015年全面完成二轮修志工作,任务十分艰巨。

二是志书特点决定要求高,内容全。一部优秀的志书,最基本的特点是体例严谨、记述准确、内容全面、资料翔实、重点突出、特色鲜明、文风端正。以上特点首先决定了志书承编单位提交的分志稿的质量必须保证。从目前各部门提交的志稿看,主要存在着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资料缺失。具体表现在层次不清、详略不当、志书规定的时间上下限不到位;重点史实和重点数据记述不清、口径不一;事业和行业发展历程断线,重大事项、重要成就缺漏;体裁单一,志书的7种体裁,述、记、志、传、图、表没有综合运用;只完成市志篇目大纲中规定的承编内容,忽视了另外五项各部门共有任务,分别是大事记、人物、图表照片、首轮志书纠错补遗、专记附录;二是立足角度不高。具体表现在事业和行业发展节

点把握不准、发展主线不清晰、重大成果不突出,止于细枝末节,没能反映出整个事业的发展变化;时代特色、地方特色、行业特色及事物本身特点不突出,对改革开放给社会生活方方面面带来的巨大变化反映不充分;三是不符合志书行文规范。具体表现在以总结报告、领导讲话、宣传表扬代替客观记述,空话、套话时有所见。所有这些问题,都需要各承编单位在编写基础稿件时予以解决,作为综合总纂,只能在体例、规范、表述上下功夫,对史料缺失等问题无能为力。各承编单位一定要重视源头,把问题解决在起始阶段。随着时间的推移、机构的变化、人员的变动、资料的湮没,越往后编写难度会越大,投入的人力、物力、精力就会成倍增加。

同志们,由上述分析我们看到,二轮修志工作的形势很严峻、时间很紧迫、任务很艰巨,我们必须本着对历史负责的精神,只争朝夕、加快进度,推动志书按时完成出版。

三、2014年地方志工作的主要任务

今年,全市地方志事业的任务是:《连云港市志》编修要全部收齐初稿、完成评审、转入总纂,四部区志要成书出版,四部县志要争取完成总纂,《连云港年鉴》要在三季度出版,各县区年鉴要加强质量建设。具体有以下四项工作:

一是把握时间节点,加快二轮修志进度。今天,我们在这里再明确一下二轮修志的时间节点,请各单位按照序时进度推进:一是初稿未组织评审的46家单位,请在6月底之前提交评审稿,完成评审和审后补充完善工作;二是初稿正在修改的21家单位,请在7月底之前提交修改稿,在9月底之前完成评审和审后修改完善工作;三是未提交初稿的5家单位,请在6月底之前提交初稿,在9月底之前完成评审工作。

另外,以上所有承编单位,包括通过评审的54家单位,请对照志书的五项共有任务,将尚未提交的部分全部于7月底之前提交。

年内,市志要完成分纂80%以上,同时进入总纂。《连云区志》《海州区志》《新浦区新志》《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志》要确保出版,《东海县志》要争



取提交终审,《赣榆县志》和《灌南县志》要完成总纂,《灌云县志》要完成初稿编写,转入总纂。志书的特点符合“木桶原理”,成书时间取决最后一块木板。请各单位务必按时间节点完成任务。

二是落实《条例》,保证修志人员和条件。盛世修志是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社会主义新方志编修更是“为党立言、为政立绩、为民立传、为史留鉴”的重要历史责任。目前,省里各行业、各条线也在编纂自己的行业志、部门志,就是为了全面、准确、客观、系统、科学地记录各行业发展的历史和现状,为后人留下历史财富。做好这项工作,是每个承编单位的光荣。地方志编纂是一项复杂艰巨的系统工程。任何一家承编单位的志稿不提交,志书便无法出版;任何一家承编单位的志稿达不到要求,志书便留下缺憾。希望各单位从大局出发,认真贯彻落实《地方志工作条例》,真正把修志工作纳入到工作目标之中,成立修志工作领导小组、明确分管领导,选调文字功底强、熟悉情况的人担任撰稿,划拨专项经费、安排办公场所,解决差旅、工作、生活及必要的条件。

三是确保质量、打造信史良志。志稿重在质量,重在基础。针对我市各部门提交的初稿,下一步关键要解决三个问题:一是资料短缺的问题。资料缺失就谈不上体例、内容、表述等种种要求,我们建议资料缺失较多的单位,组织专门的写作班子,通过召开离退休老同志座谈会、走访知情者查找资料、向社会有偿征集等途径补齐补全相关内容,尤其是突显时代特色和地域特色的文献性强、存史价值大、可鉴度高的史料不能缺少;二是立足角度的问题。负有行业管理职能的部门和单位,代表党委、政府行使职能,是全行业的管理者,要对本行业的历史发展脉络作出客观、全面、系统的记述,不能以部门、单位情况代替全市性情况。要把握事业发展主线,适当划分时期,突出重点,不能记流水账;要对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给人民生产、生活带来的巨大变革充分反映;三是文体不符的问题。要避免用文件、用工作制度、用部门工作过程、工作方法或获奖情况等代替对事件和事业的记述,

要按照行文规范的要求编纂志稿,最好安排一名文字能力强、宏观把握准的同志进行统稿,做到表述一致、文风统一。

《连云港市志》一直遵循“两审一验收”的审查制度,各单位编撰的初稿、修改稿、评审稿在正式提交给市地方志办之前,均要在单位内部进行初审,重点审查志稿所记载的内容和数据是否真实、准确,本行业重大事项、重要成果是否反映充分,本行业的历史发展脉络是否清晰,本行业的特点和地方特色是否突出体现。

志书的编修是不断补充、修改、完善的过程,因此,在分纂和总纂过程中,还会涉及资料补充和入志资料核实的问题,请已通过评审的单位,根据专家提出的意见,及时协助给予补充和核实。

四是加强创新和规范,打造精品年鉴。今年,《连云港年鉴》按照十八大提出的“五位一体”总布局,创新整体框架设计,并根据框架制作了组稿任务分解表,使撰稿内容更加明确和规范,便于各单位参照撰写。《连云港年鉴》的组稿截止时间是3月底,请各单位按照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做好2014版〈连云港年鉴〉编纂工作的通知》要求按时提交稿件。市地方志办将加快编审进度,在三季度出版,提升年鉴的时效性。各县区年鉴要进一步加强质量建设,在整体框架设计、地方特色彰显、表述规范、图照质量、编辑校对、装帧设计等方面多下功夫,提升年鉴的质量。



关于江苏沿海开发向纵深推进的调查与思考(下)

——以连云港为例

胡宝明 蔡立志 刘成文

(接上期)

三、连云港加快沿海开发的对策与措施

2011年11月,省委书记罗志军在参加省第十二次党代会连云港团讨论时指出:“沿海开发是江苏区域发展的重中之重,连云港又是江苏沿海开发的重中之重。”让连云港人倍感振奋,同时也深感重任在肩。2013年11月6日,省沿海地区发展办公室在南京召开新闻发布会,统一公布了新一轮沿海地区发展10个三年专项实施方案(2013—2015年),方案进一步深化、细化下一阶段江苏沿海地区基础设施、产业发展、城乡建设等主要领域的目标任务和重点举措对于推进沿海开发向纵深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下一步,连云港必须按照《实施方案》要求,紧紧围绕“稳中求进、好中求快”的工作主基调,坚持“项目推动、重点突破”的工作要求,全面启动沿海开发第二阶段建设,努力成为全省增长速度最快、发展活力最强、开发潜力最大的区域之一。

(一)加快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海上门户。

2013年9月7日,在中哈两国元首的共同见证下,连云港市与哈萨克斯坦国有铁路股份公司共同签署中哈过境货物运输及货物中转分拨基地合作协

议,标志着以连云港为东桥头堡的新亚欧大陆桥这一国际物流大通道,又在“丝绸之路经济带”这一国家乃至国际战略层面得到世界的瞩目。面对这一宝贵的历史机遇,连云港应该迅速行动,以点带面,从线到片,逐步形成更广范围、更大意义上的东中西部区域大合作局面。目前,连云港是中亚货物的一个中转分拨基地,下一步积极争取设立综合保税区,把“基地”发展成为“自由贸易港区”,再下一步发展为“自由贸易园区”“自由贸易试验区”。连云港从港口到全市所有的产业园区,都要建设成为中国向东、向西开放的重要载体,把连云港发展成为中国海上丝绸之路和陆上丝绸之路的关键节点城市。

(二)加快招引石化、钢铁等重大项目。据我市专业招商的同志介绍,初次接触的客商,对连云港大都有非常好的印象,这充分说明我市具有较大的对外影响力。我们必须放大对外开放优势,利用我市独特的港口资源、岸线资源、土地资源,全力以赴开展招商工作。全市所有部门、所有单位、所有干部都需要进一步增强招商引资的责任感、紧迫感和危机感。全力争取炼化一体化项目、LNG、醇基多联产、神华集团大型能源基地、正道新能源汽车等重





2013年9月7日,在中哈两国元首的共同见证下,连云港市政府与哈萨克斯坦国有铁路股份公司,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正式签订项目合作及协作协议。

大项目建设在港城落户,引导石化、原油和煤炭战略储备、冶金等重大项目布局沿海,在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前提下,实现省内钢铁产能向我市转移。

(三)加快构成高速畅达的交通网络。在港口建设上,大力推进以港口为重点的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港口转型升级和综合开发,充分发挥港口、铁路、机场、园区、节点等重要枢纽和交通载体作用,强化物流通关、航线开辟和功能配套能力,努力推进两翼港区物流载体建设和配套服务体系构建,不断提升海铁联运、海河联运和陆桥运输效能,有效促进区港联动、陆港联动。在空港建设上,加快连云港新机场建设,积极向上对接,实现连云港机场对外开放。在铁路建设上,尽早开工建设连淮扬镇铁路,争取徐连高铁列入国家规划。加大对徐圩港区等疏港铁路专用线规划建设的支持力度。在水路上,完成盐河、灌河航道整治,畅通连接大运河和长江的江海联运体系。

(四)加快建成集中、集聚、集约的现代化园区。要按照全市《产业发展规划》,对工业园区产业发展重点作出明确规定,从而引导工业项目向集群方向

发展,形成各具特色的现代产业体系。一是积极争取建成国家、省级高新区。推进市开发区“五园五中心”建设,创建国家级高新区;推动东海开发区、赣榆海洋经济开发区建设,创建省级高新区。二是加快中小企业园区建设。使中小企业园区成为吸引客商投资热土。因为很多客商投资并不需要多少土地,他们更看重城市的产业基础、劳动力成本等。中小企业园能够发挥孵化器的作用,使这些企业得到技术互补、资源共享。三是打造区域性物流中心。加快推进金港湾国际物流园、连云港保税物流园、东方国际物流园等重点物流园区建设。加强培育规模型、技术型、创新型本地物流和积极引进国内外知名物流企业,加快形成现代物流企业的高地效应。积极推进第三方、第四方物流业的发展,强化保税、信息、物联、加工等物流平台建设加快连云港综合保税区建设步伐,尽快形成以连云港综合保税区、保税港区和保税物流园区为依托的国际航运、中转、采购和转口等物流服务功能,切实增强连云港区域物流的高效、便捷和低成本的市场竞争优势,努力将连云港打造成区域性国际物流中心和地区



性物流枢纽城市。

(五)加快建设现代化海港中心城市。推动中心城市总体上向东部滨海发展,新海新区和高新技术产业区向南拓展,形成“一老三新四组团两轴一环”的城市组团发展格局。强力推进老城区拆迁改造。加快 BRT 支环线建设,实现海滨大道全线贯通。以组建江苏沿海发展银行总部为契机,加大对企业总部的招引工作,使连云港成为国内外大企业总部的首选之地。同时紧紧围绕建设“山海相拥知名旅游城市”的战略定位,强化旅游规划引领、整合旅游资源、优化空间布局,重点发展以山海旅游为核心内容的休闲观光优势项目,推进市革命纪念馆、云台山国家森林公园、二郎神遗迹公园、东海西双湖景区、桃花涧景区创建国家 4A 级景区,力争花果山景区、连岛度假区升级为国家 5A 级景区。同时依托佛教文化、海州古文化、海盐文化,重点开发好西游记文化、徐福文化和陆桥文化新内涵,通过观光、体验、演艺等多类型的系列产品开发,充分展示西游记文化精髓,实现城市旅游形象和国际国内知名度显著提升。

(六)加快建立共建共享共赢的区域合作机制。在先导区建设上,突出抓好徐圩新区建设,加快热电、污水处理等基础设施建设进度,开工建设 27 条道路,建成 40 公里水管网。在政策争取上,落实国家和省建设连云港国家东中西区域合作示范区的各项政策,落实相当于省级投资主管部门的项目管理权限。按照东中西区域合作示范区五大功能区的定位,着力打造为中西部服务的平台。同时将示范区范围逐步扩大,以沿海高速公路为界,建设“连东新区”,做成升级版的东中西区域合作示范区。在合作机制上,争取建立示范区建设部省联席会议制度,进一步完善示范区共建共享和产业转移政策,加快构建出口产品生产基地等功能平台,积极引进中西部地区参与示范区建设。全力突破重大政策事项,推动国家和省支持政策发挥效应。

(七)加快形成优质高效的投资环境。打铁还需自身硬,作为招商引资的服务部门要主动作为、积极行动,为招商引资铺路搭桥。一是领导带头。在招商引资工作中,领导带头应该成为一种风气。

因为在具体的招商引资活动中,优惠政策是客商必要问的一句话,而我市的很多政策,如土地上的优惠、税收上的优惠在书面上是和其他地区一样的,不敢越雷池一步。即使有让步的可能,也要等待主要领导拍板,私下交谈才行。因此,领导在幕后招商只会浪费很多宝贵的机会。在下一步的招商引资工作中,各级领导要从繁杂事务中解脱出来,每季度召开一次全市日韩港台资招商工作汇报会,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亲自参加。县区领导实行重大项目责任挂钩制度,要和招商同志一起招引项目。二是要不断改善服务环境。大项目、大产业是各地招商引资的重点,有人把他们比喻为“人见人爱的美女”,没有一股“爱拼才会赢”的劲头很难攻下来。要制定措施,促使市级机关和县区一起领办项目,市级机关干部和县区同志一起参与项目。由市优化办牵头,对全市审批项目的程序进行一次全面梳理,必须做到在周边地区,我市的审批时间最短,审批程序最少、审批收费最低。三是软环境考核监督到位。所有执法部门对外资企业的检查必须经过市软环境建设办公室备案,否则不得随意检查。供电、供水部门在对外资企业断电、断水之前,必须报软环境办公室批准。软环境办公室不能满足于每年一次的测评,每个月都应深入基层、深入企业调查走访,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每期简报必须有负面的报道以及处理的措施。每年软环境建设办公室在组织对全市各机关单位软环境测评的同时,可以由市重大项目办公室在征求企业意见的基础上对全市软环境建设工作作出再评价。

责任编辑 邱仕明



实现东方大港梦的导航人(2)

——深切回忆谷牧同志与连云港港口建设工作

赵 泳

(接上期)

二、严谨科学摘掉回淤严重的历史帽子

上世纪六十年代以后,国际船舶向大型化、港口码头向深水化发展成为必然趋势。如果连云港依然停留在原有的三五千吨级的水平上,显然是不能适应国家对外贸易和腹地经济发展的要求了。改变连云港港口建设的现状,实现深水化的目标,就必须依靠科技进步来回答回淤、软地基、陆域狭小等一系列关键技术问题,消除许多人的思想疑虑。1973年,谷牧、彭冲等领导同志视察连云港时,就明确地指出了这一点。虽然,那时还没有提出“科技兴港”这一口号,当时,连云港建港人已经清醒地认识到不科学地回答这一系列问题,就不能实现构筑东方大港的梦想。

在连云港建港指挥部成立后1个月中,建港干部群众抓的第一件大事就是落实谷牧同志的抓好科研的指示精神,筹备和召开了连云港历史上第一次回淤问题专家研讨会。

连云港港口研究工作最早起步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江苏省建港指挥部成立后进一步推向高峰,形成了一个有组织、全方位、多学科、大协作的攻坚总体战。而1973年7月26日召开的第一次回淤问题讨论会,可以说既是对以往科研成果的回顾和总结,也是这场新总体战的序幕。

在1965年前后,当时为了弄清连云港及其附近海域地形变化规律,以及大范围泥沙输移动向,

华东师范学院、青岛海洋研究所等单位的同志就开始对北起山东日照龙山嘴,南至废黄河口长达200公里的海滩地貌和近岸沉积物的变化情况进行了深入考察。完成了多次动力地貌调查,300多平方公里范围的大面积地质取样和多个柱状剖面的分析研究,收集整理了从1913年以来连云港港口附近区域的历史地形图。为了弄清连云港地区的潮汐情况和泥沙输移特征,华东师范大学、南京水科所、华东水利学院和青岛海洋研究所的同志,从1965年11月至1973年8月,曾经5次进行了不同规模的同步以及单点水文测验,初步掌握了连云港海峡内外、东口门外,以及外航道轴线等在各种气候条件下的流速、流向、含沙量等一手实测资料,为回淤特征和进行回淤模型实验,提供了较为可靠的依据。这种海上同步水文测验,后来在1974年11月至1978年又进行过3次,实验范围一直扩展至-8米等深线。这种科学严谨的态度和实践不仅为今天连云港的大发展、大建设提供了智力保障,夯实了现代科学建港的基础;同时,也是践行谷牧同志科学建港思想的极好例证和具体实践。

第一次回淤问题讨论会收到了大量科研论文,其中华东师范大学的《海州湾岸滩的演变过程和泥沙流动动向》《连云港地区泥沙来源和回淤初步估算》等,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和华东师范大学联合发表的《关于连云港港口扩建方案回淤问题的意见》《连云港历史概貌和现状》等,还有华东水利学





20 世纪 80 年代初的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河港研究所的连云港整体水流物理模型试验(赵鸣提供)

院、青岛海洋研究所等单位关于回淤问题的研究成果,为会议的圆满召开做了充分的准备。

1973 年 7 月 27 日上午,第一次连云港港口回淤问题讨论会在连云港市三招正式开始了。会议经过 3—4 天的充分讨论,对主要问题的讨论结果形成了一个《纪要》。

首先是连云港泥沙的来源。经过认真讨论一致认为:海州湾的泥沙是一股来自岚山头,一股来自废黄河口一带,向湾顶汇合。自废黄河口沿岸上的北上的泥流,绕过本区连岛外侧,部分泥沙随流进入海峡东口;而海州湾顶临洪口浅滩泥沙,经风浪掀动,则随流经海峡西口入港;形成双向泥沙流。

其次,会议对连云港海峡的泥沙供应强度变化进行了认真的分析讨论。根据历史事实和近年来的调查研究分析结果,大家认为连云港港区回淤量不大;国内没有回淤的港口是很少的;淤泥对于连云港港口建设不是大问题。例如:连云港港口回淤量与货物吞吐量相比,约为年吞吐 10 吨货,需要挖 1 立方米泥沙,远小于天津新港、上海港的回淤量。庙岭方案实施后,估算回淤量也不会超过现在的比例。因此,排除了连云港回淤严重的顾虑。从历史和现在获得的水文、水深、泥沙和疏浚的资料分析说明,大多数代表认为:连云港港区的回淤量有逐渐

减少的趋势;港域和航道回淤量有明显减少趋势;并一致认为:连云港自然条件较好,回淤量不大,腹地广阔,是一个有发展前途的天然良港。

这次会议应该说在连云港建港史上是具有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的。首先是这次会议是在谷牧同志领导和指导下召开的,开启了连云港“科技兴港”的先河,后来连云港建港人矢志不渝地坚持科学建港,解决了一个又一个的不可回避的建港难题,使得今天的连云港建设顺利前行在亿吨东方大港的道路上。其次,此次会议上,大多数代表首次提出并认可了“连云港港区的回淤量有逐渐减少的趋势”“港域和航道回淤量有明显减少趋势”的科学论点。尽管,这个论点当时不是所有到会代表都接受的,特别是部分政府权威部门代表的认同。隔了多年,连云港又举行了第二次、第三次回淤问题讨论会,才逐步

得到了绝大多数专家,特别是权威专家的认同。但是,为最后摘掉连云港港口头上“回淤严重”的帽子,起到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站。

1974 年,国家下达连云港的建设投资计划为 3044 万元,相当于 1973 年实际完成投资的 2.37 倍。1974 年 8 月 13 日至 14 日国务院港口建设领导小组专门召开会议研究连云港港口建设问题,当时交通部的水基、铁基、计划、物资等有关局的负责同志,以及连云港建港指挥部的负责人参加了会议。大家听取了连云港建港的情况汇报,专门讨论了连云港港口建设工作的困难和问题,并逐项讨论落实。在听取工作汇报后,谷牧同志专门强调说:“1%也不能松!要千方百计排除万难去完成任务。今天这个会专门讨论连云港的建设问题,希望大家给予支持”。8 月 16 日,国务院港口建设领导小组作出了《关于加强连云港建设的几点意见》的决定,进一步用具体行动落实谷牧同志的指示精神,有力地加快了连云港港口建设的进程。1974 年 12 月 19 日,连云港首个万吨级煤炭专业码头建成投产。这是连云港港口建设的一大突破,标志着连云港跨入具有万吨级深水泊位的港口行列,也是连云港自周总理发出“三年改变港口面貌”后第一个建成投产的大工程。



1975年1月,时隔不到1年,连云港举行了第二次回淤问题讨论会。参加会议的有上海师范大学、天津水运研究所、南京水利科学研究所、华东水利学院、青岛海洋研究所、交通部水规院、上海航道局、第一航务局设计所、江苏省水文地质大队、连云港港务监督等11个单位19名科技工作者。交通部水基局也派员指导。代表们参观了港口现场,提取了连云港建港指挥部的工作介绍,由天津水科所、上海师范大学、南京水科所等单位汇报了一年来取得的新的科研成果。会议重点讨论了连云港港区回淤总趋势,规划方案平面布置对于防淤、防浪的影响,并具体研究安排了下一步的研究工作。会议代表根据一年来野外工作和资料分析,再次确认了上海师范大学在第一次回淤讨论会提出的“连云港海峡处于冲淤相对平衡并略有冲刷的趋势”的结论是正确的,并进一步做出了补充。会议认为下一阶段回淤研究,主要围绕规划方案平面布置的防淤、防浪效果进行,工作重点是模型实验和现场观察。

1975年6月25日,在国务院港口建设领导小组召开的全国港口“五五”时期建设规划会议上,通过了连云港开辟庙岭新港区的规划方案,确定第一步先行建设庙岭深水煤炭专业码头。同年8月,连云港正式编制上报了《关于连云港庙岭新港区及新建庙岭煤码头工程计划书》和《关于配合连云港港区总体布置港前编组站及港区车场规划设计任务书》,提出了建设2—3个万吨级煤炭泊位3个,装船能力1000万吨。这个报告经交通部审定后,于1976年7月报国家计委。1977年7月25日,国家计委正式批准连云港庙岭煤码头建设设计书。1977年8月,江苏省和连云港市正式提出在连云港建设大型钢铁联合企业的建议。国务院有关部委和江苏省、连云港市委提出连云港是否可以建设5至10万吨级大型深水泊位的新课题,回淤问题是个关键!于是,1977年9月18日至22日,连云港建港指挥部举行了第三次回淤问题讨论会,这也是连云港建港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回淤问题研讨活动。会议邀请了上海师范大学、华东水利学院、南京水利科学研究所、天津水运研究所、南京水利科学研究所、青岛海洋研究所、交通部水利规划设计院、上海航道局、第三航务工程局、江苏省水文地质大队、连云港港务局10个单位和各类专家、技术人员,总计40多人。主要研究成果有上海华东师范学院河

口海岸研究室王宝灿、虞作英的《关于在连云港建设大型深水泊位可行性的初步意见》、南京水利研究院刘家驹的《连云港整体淤积模型清水实验研究》、天津水科所冯玉林、刘汉波的《关于连云港建设矿石深水码头泊位的可行性及回淤量估算》、上海航道局郝学钧的《连云港深水航道设计的几个问题》、连云港建港指挥部金缪的《连云港水力泥沙特征和回淤量估算》、连云港港务局杨保真的《连云港港口航道的优点》等学术文章。国际著名水利和海岸工程学术权威、两院院士严恺教授也参加了会议,并做了重要讲话。特别是从事连云港回淤研究的科研人员通过历史资料、现场勘测和计算分析工作认为:本地区泥沙来源苏北,由于1855年(清咸丰5年)黄河改道山东入海使连云港地区泥沙供应来源由黄沙输沙为主改变以海水动力对岸滩冲刷物质的沿途补充为主,其向连云港海峡供应泥沙强度仅为黄河来源数量的十分之一,因此本地泥沙供应量骤减。特别是一个多世纪以来,海岸侵蚀使岸滩渐趋平缓,岸线后退速度日趋缓慢;加上解放后的岸滩保护和沿海筑闸,使苏北沿海对本地区的泥沙供应更趋减少,因而几十年来海州湾南部和连云港地区水下地形变化缓慢,近二十年来海峡还有普遍刷深之势。大家一致认为:1975年1月第二次回淤会议所作出的连云港海峡目前处于冲淤平衡略有冲刷的结论是正确的!这个结论也得到了严恺院士的肯定。

会议以后,连云港开展了大规模的工程地质勘探,摸清了连云港港区的水下地形;在港口东门口外实践性地开挖了3公里长的外航道,实际模拟泥沙淤积情况。后来,正当连云港港口建设即将迈入跨越发展车道的时候,在1978年有人重提连云港回淤问题,李先念副主席对此十分重视,并于1979年1月1日批示,再次要求谷牧副总理主持处理此事。谷牧同志也当日批示:“请叶飞同志组织人准备,准备好我们即开会。召开双方的专家会议,要真正讲出道理。”今天我们重新回忆那段历史,可以深切感受到谷牧同志对待工作严谨认真的科学态度,也深切感受到“科技兴港”的重要和艰巨。(未完待续)

(作者赵泳,原连云港港务局党委书记)

责任编辑 张伟敏



以史鉴今传递正能量

资政育人助推新发展

连苏文



近年出版的党史书籍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高度重视党的自身建设，首先从解决“四风”入手，出台“八项规定”，“老虎”“苍蝇”一起打。以“永不动摇信仰、永不脱离群众”为目标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是党中央加强新形势下党的自身建设的一项重要举措，作为我们每一位党员干部，应当与党中央保持一致，积极投入到教育实践活动，做好思想、理念上的准备。

关于党史工作，毛泽东同志在延安就教导要全面、历史、辩证地开展研究，以资借鉴。习近平总书记也多次就党史研究和党史工作发表重要讲话，指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学习党史、国史，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党和国家各项事业推向前进的必修课”“这门功课不仅必修，而且必须修好”。这些讲话和论述，给党史工作和党史工作者提出了新的任务和要求。我们不仅要带头学习党史，从党的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真实、客观、准确地记载好党的历史，更要服务、推动广大党员干部、青少年学党史、知党史、感党恩、跟党走。为了更好地履行好党史工作者的职责，党史工作者要坚持做到以下几点：

一要坚定理想信念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信仰，理想信念是人们的行动指南。革命战争年代，无数革命者无论是抛头颅洒热血，还是被自己的同志冤屈迫害，都始终没有放弃对党



的信仰。许多被查处的干部,忏悔自己堕落的根本原因是没有了信仰,认为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是虚无缥缈的东西,与周围的人对比,心理不平衡,捞实惠成为目标追求。那么,社会主义能不能实现?我们选择的道路是不是正确的?什么是自由、民主?很多人思想不那么坚定了。作为一名党员、一名党史工作者,我们就是要从世界社会主义 500 年历史、中华民族近代 170 多年奋斗史和我们党成立 90 多年、执政 60 多年、改革开放 30 多年的历史中来汲取营养,增强对选择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性、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正确性和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认识,从而对我们的道路充满自信、理论充满自信、制度充满自信。

二要坚持党史工作者正确的世界观、方法论

如何研究、看待我们的党史?毛泽东同志指出,要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研究、看待历史。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从中国历史、人类文明进步史的纵向方位和世界发展的横向坐标出发,全面地、辩证地将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放在当时当地的历史背景及其条件下去对待去把握,科学评价历史事件及历史人物。把握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和主线、主流和本质,不纠缠于细枝末节,不为杂音噪音所扰,不为传闻谣言所惑,正确看待党史上的大是大非,用人民眼光看责任,以民族的使命看历史,以未来的前景看历史。

三要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做一名合格的党员干部

人生在世德为先。作为一名党员干部,首先要带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遵守党章、党纪,“做一个纯粹的人,做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要是自己的道德素养不够,凭什么去管理和领导属下工作呢?又凭什么给群众做表率?作为史志工作者,我们必须有“史官”情怀,做大写的人,富贵不淫,威武不屈,秉笔直书。今天,党和政府为我们的工作提供了很多便利条件,我们没有理由不好好工作。我们理当发扬螺丝钉的精神,以“功成不必在我”的宽广胸襟,用使命凝神聚气,用责任激发动力,用党性提升境界,把工作当事业,把事业当追求,充满感情,倾注热情,保持激情,耐得住寂寞、守得住清贫,忠实地记录、传承好党和国家的革命史、建设史、发展

史。

四要认真履行史志工作职责

史志工作,第一位的是存史。当前,全市上下正积极抢抓“一带一路”建设机遇,推进国际性海港中心城市建设。史志工作要按中央领导同志要求,更加突出开创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间段历史的研究,即时跟进党中央的步伐,即时跟进历史的步伐,及时记载、总结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顽强奋进、波澜壮阔的创新实践和新鲜经验,随时发生、随时记录、随时总结,为宣传好推进好党和人民的伟大实践作贡献。当前,要在全面完成地方党史“二卷本”编撰工作的基础上,继续深化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这两个时期的党史研究,进一步挖掘各个历史时期的党史资料,注重征集老一辈革命家、党和国家领导人在连云港的工作资料,征集重大事件、重要人物、重大决策及实施过程中的有关专题资料,征集领导干部及社会人士个人留存的党史资料,搞好口述历史资料征集和组织老干部撰写革命回忆录,力争史料征集完整而无疏漏、连续而无间断、真实而无水分,并得到妥善保管、精心整理和有效利用。二是资政。要认真总结连云港在不同发展阶段创造的成功经验和进程中的历史教训,及时总结连云港各行各业大开发、大建设、大发展中创造和积累的丰富经验,把带有规律性的东西挖掘出来,形成一批有深度、有新意、有说服力的资政成果,为解决前进道路上的新问题提供历史借鉴。三是育人要开展形式多样的党史“六进”(进机关、进学校、进企业、进军营、进社区、进农村)活动,通过党史宣传教育,用党的伟大成就激励人,用党的优良传统教育人,用党的成功经验启迪人,用党的历史教训警示人,引导全市人民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为热爱连云港、建设连云港、发展连云港,提振精气神,凝聚正能量。四要站在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第一线。改革开放,国门大开,利益多元,思想多元,包括历史虚无主义在内的自由主义思潮不断涌现,社会上一些历史再认识之风一度盛行。国际敌对势力亡我之心不死,从没有放松对我实施“西化”、“分化”图谋,他们拿党史国史说事,想方设法歪曲我们党的历史、丑化我们党的形象、诋毁我们党的领袖,否定新民主主



义,否定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就是从否定共产党的历史、否定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打开缺口的,教训惨痛。作为党史工作者,要坚定地站在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第一线,始终保持高度的政治敏感性和政治警觉,实事求是地研究和宣传党的历史,进一步强化阵地意识和责任担当,坚决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对党史领域出现的各种错误思潮和言论,决不能听之任之,更不能附和传播,要主动发声,敢于亮剑。要有针对性地研究社会高度关注的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以充分的历史事实和对历史现象的科学解读,教育干部群众,引导社会舆论,回击谣言谬论,当好党的忠诚卫士。同时,还要站在国际历史斗争的第一线,对日本右翼势力肆意篡改教科书,美化侵略,篡改史实,开脱罪责的行为予以坚决回击。

五要立足本职,努力成为史志工作的专家、学者和组织者

作为史志工作者,既是过去历史的研究者、考证者,又是正在发生和即将发生的历史的记录者、见证者、参与者和实践者,一定要增强使命意识,将史志工作放在全市工作大局谋篇布局,主动作为,努力提高党史工作科学化水平。

要成为党史研究的专家学者,以最新的党史研究成果教育人民。通过对社会主义理论、道路、制度的研究,对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实践的研究,对重大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地方史课题的研究,从历史的角度回答好当前党史领域热点问题,做好解惑释疑工作,指导广大党员群众进一步认清发展方向,把智慧和力量凝聚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共识上,更加坚定前行的信心和决心;要加强党史研究方法的研究,既要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优良传统,坚持和发展党史工作积累的成功经验和方法,也要吸收借鉴古今中外史学研究的有益经验和方法。

要长于学习、精于学习。史志工作内容广博,这就要求史志工作者要具有深厚的理论素养,丰富的知识内蕴,成熟的思辨能力,学习是唯一的途径。当前,要努力学习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以及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精神,准确把握新时期对党

史工作和党史工作者的任务和要求;要学习历史知识,加强对世界史、世界科学社会主义历史、党史、国史及地方史的学习,深入思考历史才能有宽广的眼光和胸怀;要学习文化知识和科技知识。史志是百科,不仅需要通晓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社会、写作、宣传等知识,还要掌握电脑、网络、微信、微博等现代工具,更好地为工作服务。国学大师王国维总结学习的三个层次,史志工作者也可借鉴,既要有“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的探索精神,更要有“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的求道精神,从而达到“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境界,不断实现知识向能力的转化。

要不断创新,提高科学化水平。用经得起历史、实践检验的创新成果,提高党史工作的质量和效率。创新的一个方法就是立足现实,整合资源,发挥史志办代表党委政府组织作用,加大与档案、党校、行政学院、高等学校系统、社会科学系统等部门之间的联系,把这些研究部门的党史人才和曾经参与过党史工作、党史研究的兴趣爱好者组织起来,发挥整体优势,积极开展重大党史课题联合攻关,提高党史研究的质量和效率。要充分利用电视、报刊、广播等大众传媒的力量,加强党史研究成果的宣传力度,认真分析研究社会大众对党史成果的需求,有针对性地将党史编研成果转化成为大众喜闻乐见的、符合不同层次人们学习了解党史的理论读物、电视片等多种党史文化系列“产品”;利用互联网、手机等新兴媒体,不断扩大主流党史信息传播渠道;要发挥党史教育基地作用,充分利用市革命纪念馆、抗日山烈士陵园、安峰山烈士陵园等党史教育基地直观形象、立体生动、图文并茂的红色资源,不断增强党史宣传教育的震撼力和感染力。要科学策划活动载体,围绕重大党史纪念日、重大党史事件和人物纪念日,立足实际,及早谋划,精心设计载体,借助上级平台,市委、市政府及各部门的力量,开展形式多样的党史宣传教育活动,在突出特色中求发展,在服务现实中求实效。



邓小平关于群众路线的理论和实践举隅

——学习《邓小平文选》的几点体会

韩翠林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毛泽东、邓小平作为我们党第一代、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心中时刻装着人民群众,一生坚持党的群众路线。今年是邓小平同志诞辰 110 周年,研读《邓小平文选》,到处都闪耀着邓小平关于党的群众路线的理论和实践光辉,他对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的丰富发展和发扬光大,贡献不可磨灭,意义十分深远。



《邓小平文选》

一、“党离不开人民,人民也离不开党”,系统阐释了党和人民群众血肉关系的重要性

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在特殊的艰难环境中领导革命并取得胜利的“力量源泉”和“传家宝”。1941 年,邓小平任八路军一二九师政治委员,在其撰写的《党与抗日民主政权》一文中指出:“确切地说,党的优势不仅在于政权中的适当数量,主要在于群众的拥护。民主政治斗争可以使党的主张更加接近群众,可以使群众从自己的政治经验中更加信仰我党”(《邓小平文选》第 1 卷 P9 页),“我们要在民主政治斗争中,保证党对政权的领导,我们更要在民主政治斗争中,使党成为群众的党”(《邓小平文选》第 1 卷 P21 页)。

1956 年,邓小平在党的八大上作《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时,从理论上又阐述了党的群众路线的主要内容:人民群众必须自己解放自己;党的全部任务就是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党对于人民群众的领导作用,就是正确地给人民群众指出斗争的方向,帮助人民群众自己动手,争取和创造自己的幸福生活。因此,党必须密切联系和依靠群众,而不能脱离群众,不能站在群众之上;每个党员必须养成为人民服务、向群众负责、遇事同群众商量和同群众同甘共苦的工作作风。如果我们严重脱离群众而不能坚决、彻底、立即地改正,就一定使我们的工作遭受损失,使人民的利益遭受损失,那就丧失了力量源泉,就一定失败,就会被人民抛弃。他在报告中第一次向全党鲜明地提出了“由于我们党现在已经是全国执政的党,脱离群众的危险,比以前大大地增加了,而脱离群众对于人民可能产生的危害,也比以前大大地增加了”的问题(《邓小平文选》第 1 卷 P221 页),立意到位且深刻。邓小平还指出:我们党同广大群众的联系,对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是几十年的斗争历史形成的。党离



不开人民,人民也离不开党,这不是任何力量所能改变的。党的组织、党员和党的干部,必须同群众打成一片,绝对不能同群众相对立。全党同志,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必须经常记住这一点,经常用这个标准检查自己的一切言行,不断加强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我们党成熟、有战斗力的重要原因和显著标志。所有这些,都立场鲜明地回答了为什么党在执政后,还要更加注意、始终贯彻执行群众路线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这句浅显而又朴实的话语,是邓小平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的思想来源和一生践行群众路线的真实写照,为我们放好了样子、树立了标杆。

二、“党的全部任务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高度概括了党的群众观和党的根本宗旨的一致性

中国共产党来自于人民、植根于人民、服务于人民又取信于人民,是中国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邓小平从党的基本群众观点出发,对党的根本宗旨作了精辟的论述。他说,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中先进分子的集合体,它对于人民群众的伟大的领导作用,是不容怀疑的。它之所以成为先进部队,之所以能够领导人民群众,正因为,而且仅仅因为,它是人民群众的全心全意的服务者,它反映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意志,并且努力帮助人民群众组织起来,为自己的利益和意志而斗争。“中国共产党的含义或任务,如果用概括的语言来说,只有两句话: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切以人民利益作为每一个党员的最高准绳”(《邓小平文选》第1卷P257页)。根据上述原则,邓小平认为必须正确处理好两个关系,做到两个牢固树立:一是领导与服务的关系,牢固树立领导就是服务的观点;二是“公仆”与主人的关系,牢固树立当好人民公仆的意识。他说,我们的同志如果对个人的、家庭的利益关心得太多了,就没有多大的心思和精力去关心群众了,顶多只能在形式上搞一些不能不办的事情。因此,党的各级组织和领导干部一定要关心群众生活,真正为群众排忧解难,多办实事。

一个为人民群众谋利益的政党,最怕听不到人民的声音,最怕听不到基层的汇报。战争年代,邓小

平就提出:“我党要善于在一切工作中,一切运动中,大大发扬大众的民主主义作风,与一切不民主的现象作斗争。有了民主主义作风,才有广大的群众运动;有了广大的群众运动,才是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党”(《邓小平文选》第1卷P21页)。改革开放以后,他又提出一定要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制定各项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以此为标准来检验党的领导和作风。他曾反复强调,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确定的党的基本路线和一系列方针政策不能变,也变不了,因为实践证明是正确的,是行之有效的,是受到人民拥护的。如果改变,老百姓不答应。所以,当一个共产党员,就要自觉服从党的路线和政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三、“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深刻论述了贯彻群众路线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必要性

1、贯彻党的群众路线,“重要的是做好经常工作”。

1961年12月,邓小平在一次讲话中特别强调重要的是做好经常工作,并不无自豪地说:“群众路线是我们党长期的很好的传统。我们的工作向来是很深入的,过去在农村也好,全国胜利之后也好,各种工作是做到家的。不是吹牛皮,一些外国党也真正相信我们的群众路线”(《邓小平文选》第1卷P293页)。“共产党长期联系群众办好事,和群众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解放战争是人民战争,依靠人民才能做到这一点”。(《邓小平文选》第1卷P295页),正是从这些切身体会出发,邓小平特别要求干部要善于从当地群众的日常生活中去发现问题,寻求机会解决问题。他说战士替居民挑水,官长替士兵盖被子,在火线上开“诸葛亮会”,保护俘虏的健康和自尊心,不搜俘虏的腰包,这些看起来都是小事,但一系列的伟大胜利正是同这些小事分不开的。而建国后这几年,经常的细致的工作忽略了,这是党的领导方面的问题。所以“现在党的工作、群众工作要着重把经常工作建立起来”(《邓小平文选》第1卷P295页)。

2、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一定要关心群众生活”。

党执政后,如何在推动社会发展中密切党同人



民群众的关系,是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一个根本问题。1975年8月,邓小平在国防工业重点企业会议上讲到整顿问题时,第三个题目就是“一定要关心群众生活”。他说:这个问题不是说一句话就可以解决的,要做许多踏踏实实的工作。比如钢铁工人劳动那样重,而蔬菜少、肉类缺,基本条件都保证不了,这样的问题就必须具体地去研究解决。他甚至谈到了山区的三线工厂养鸡、养兔、养鸭、养猪等副食品基地建设问题,突出强调:“群众对生活方面的议论是相当多的,不要以为都是讲怪话。我们党和国家一定要关心群众生活,现在应该提出这个问题了”(《邓小平文选》第2卷P27页)。邓小平还一再要求努力帮助群众解决能够解决的困难,暂时无法解决的,要耐心地向群众作出解释,等待机会再解决。不能放空炮,许诺了又不做,这样最容易伤害群众,失去群众的支持。这一点,每一个共产党员任何时候都要牢记。

3、贯彻党的群众路线,“要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

1956年,邓小平曾专门分析说:“如果不从认识方法上解决党的主张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问题,那末,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仍然不能真正地解决”(《邓小平文选》第1卷P218页)。实践证明,许多人并非在主观上没有为人民服务的愿望,但他们却把工作做坏了,使群众受到重大损失。这是因为他们自认为是先进分子,是领导者,比群众懂得多,因而遇事不向群众学习、不同群众商量,结果是他们出的主意,经常在群众中行不通。但是,他们又不从错误和失败中吸取教训,认为错误和失败,只是由于群众落后和其他临时因素的影响,因而又滥用党的威信,继续一意孤行,这就使他们的错误和失败愈来愈严重,这种主观主义妨碍着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党的工作中的群众路线,要求党的领导保持谦虚和谨慎的态度,而“骄傲、专横、鲁莽,自作聪明,不同群众商量,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为了自己的威信而坚持错误,是同党的群众路线根本不相容的”(《邓小平文选》第1卷P219页)。无论做什么都要相信和依靠群众,重视群众的经验,最根本的是要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正如邓小平所说:“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

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他的这段话,充分体现了我们党的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思想作风和工作方法。因此,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必须提倡敢想敢说的精神。既要坚定地相信和依靠群众,又要善于教育和引导群众前进,这是贯穿邓小平理论的一个重要思想。

4、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必须坚决反对官僚主义”。

1980年8月,他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讲话中再次指出:官僚主义现象是我们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广泛存在的一个大问题。它的主要表现和危害是:高高在上,滥用权力,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好摆门面,好说空话,思想僵化,墨守成规,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办事拖拉,不讲效率,不负责任,不守信用,公款旅行,互相推诿,以至官气十足,动辄训人,打击报复,压制民主,欺上瞒下,专横跋扈,徇私行贿,贪赃枉法,等等。这无论在我们内部事务中,或是在国际交往中,都已达到令人无法容忍的地步。如果不认真解决这些问题,就很难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我们就要严重地脱离广大群众。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他又一次指出:形式主义也是官僚主义。要腾出时间来多办实事、多做少说。要扎扎实实地解决问题,不能搞花架子、做表面文章。对此,邓小平从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高度提出了解决官僚主义问题的根本思路,强调一要靠思想教育;二要靠改革。要加快政治体制改革,革除领导制度、组织制度中的弊端,铲除官僚主义产生的温床。

在深入开展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题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我们重温邓小平关于党的群众路线的有关论述,结合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对于坚决反对“四风”、努力追求善政,进一步密切党与群众的血肉联系,凝聚起全面深化改革的正能量,把中华民族伟大的“中国梦”变为美好现实将具有重大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作者系中共灌南县委党史办公室主任)

责任编辑 邱仕明



党的群众路线 发展脉络综述

赵维娜

“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党的群众路线的主要内容。群众路线作为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之一，是我们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发展的历史经验一再证明，群众路线是我们的事业不断取得胜利的重要法宝，也是我们党不断焕发生机与活力、永葆先进性的力量源泉。在全党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背景下，从党史的角度梳理群众路线的发展脉络，有助于我们在对历史的深入思考中把握群众路线的内涵，坚定理想信念，提高党性认识，在实践中更好践行群众路线。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群众路线的提出与形成

1、群众路线的思想萌芽

党对于群众的认识是在其实践中逐步形成和发展的。在建党和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探索依靠力量中注意到了人民群众的力量，认识到了工作的重点对象。

五四期间，毛泽东就十分敏锐地意识到中国革命运动中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他强调“民众的大联合”是改造社会、改造国家的“根本的一个方法”。党的一大通过的纲领中明确提出了“把工农劳动者和士兵组织起来”的要求。党的二大通过《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中指出，我们共产党应当是无产阶级中最有革命精神的广大群众组织起来为无产阶级之利益而奋斗的政党，为无产阶级做革命运动的急先锋。我们既然是为无产群众奋斗的政党，我们便要“到群众中去”要组成一个大的“群众

党”，“党的一切运动都必须深入到广大的群众里面去”，“我们的活动必须是不离开群众的”。中共六大提出“党的总路线是争取群众”。

这一时期，党在工会运动、农民问题、共产主义青年团工作中都注意要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宣传群众，争取群众。党已经认识到了群众的重要性，但是并没有明确提出群众路线这一概念，这时期只是群众路线的思想萌芽阶段。

2、群众路线的提出与形成

我们党的历史上第一个使用“群众路线”概念的是李立三，他于1928年11月在同江浙地区党的负责人谈话时说：“在总的争取群众路线之（下），需要竭最大的努力到下层群众中去。”但此时群众路线的含义还不明确。第二个明确使用群众路线概念的是周恩来，他在1929年9月起草《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即著名的九月来信）中写到“关于筹款工作，亦要经过群众路线，不要由红军单独去干”。1929年12月，毛泽东在根据“九月来信”精神起草的《红军第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决议案》，简称《古田会议决议》中指出：“一切工作在党的讨论和决议之后，再经过群众路线去执行。”“党在上世纪20年代发动和领导工人运动、农民运动、武装斗争中取得了群众工作的初步经验”。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开展了整风运动，在全党掀起了大规模的反对教条主义、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的斗争。1943年6月，毛泽东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这一重要著作中，第一次较为系统地初步阐述了党的群众路线。把从群众



中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这一基本领导方法提到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高度做出理论概括,科学地阐述了群众路线领导方法所包含的基本内容和主要表现形式,分析了这一领导方法的各个环节、步骤及其全过程。“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它表明,党的群众路线领导方法已经具备了完备的科学形态和精深的理论内容。

1945年5月,刘少奇在党的七大上作了《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对群众路线做了高度定位,他指出“党的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根本的政治路线,也是我们党的根本的组织路线。”可见群众路线工作方法已经成为党在一切实际工作中实现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际、领导与群众相统一的根本路线和根本方法。他还进一步从毛泽东倡导的群众路线中提炼出四个群众观点(即一切为了人民群众的观点、一切向人民群众负责的观点、相信人民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观点、向人民群众学习的观点)。群众观点的引入,丰富了群众路线的理论内涵。此刻,群众路线正式形成。

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群众路线的挫折与坚持

新中国成立后,党成为执政党,面临的国内外形势和历史方位发生了深刻变化。如何贯彻群众路线对我们党是个重大考验。党的八大上,邓小平在修改党章的报告中,总结了党成为执政党后执行群众路线面临的两种严重情况:一是官僚主义,“执政党的地位,很容易使我们同志沾染上官僚主义的习气。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的危险,对于党的组织和党员来说,不是比过去减少而是比过去增加了”。二是宗派主义,“执政党的地位,还很容易在共产党员身上滋长着一种骄傲自满的情绪。有一些党员,稍稍有点工作成绩,就自以为了不起,就看不起别人,

看不起群众,看不起党外人士,似乎当了共产党员,就比非党群众高出一头,有的人还喜欢以领导者自居……这实际上是一种狭隘的宗派主义倾向,也是一种最脱离群众的危险倾向。”结合这两种情况,邓小平论述了贯彻群众路线必须采取的一系列具体措施。八大通过的党章第一次使用和写入了“群众路线”的概念,要求全党“必须不断地发扬党在工作中的群众路线的传统”。

1962年初,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刘少奇联系1958年以来党的工作的经验教训,进一步从理论上论述了群众路线。他指出,概括地说,群众路线的基本点就是:第一,相信人民群众,相信他们能够自己解放自己,相信他们是历史的创造者。第二,党必须根据群众的实践来检验自己的工作,党的方针、政策、措施都必须“从群众来,到群众中去”。指出,群众运动的内容是多种多样的,适应于不同的内容有不同的形式,不能千篇一律。把群众运动当做群众路线的唯一方式,是不正确的。形式主义的内容,绝不是真正的群众运动,更不是群众路线。违反群众路线的所谓的“群众运动”,不仅不能真正反映群众的意见和要求,而且损害了群众的积极性、损害了党的威信。他要求“各级党组织必须认真地讨论一下什么叫做群众路线的问题。一切党员干部,凡是还没有真正懂得党的群众路线的,都应该从头学起”。

然而,这一时期,随着党内左倾思潮和左倾路线的兴起,群众路线的执行一再被打断,而且被错误地用来搞阶级斗争、政治运动。尤其在“文化大革命”中,群众路线和群众运动完全沦为“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整人”“打人”的手段,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成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普遍受到“群众性”的批判和斗争,广大党员被停止了组织生活,党长期依靠的许多积极分子和基本群众受到排斥。“文化大革命”名义上是打着直接依靠群众、实行群众路线的旗号,实际上偏离了正确的轨道,给党的事业和人民利益所造成的严重后果,是根本背离群众路线精神实质的所谓的“群众运动”所导致的恶果。

三、改革开放新时期——群众路线的丰富与发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我们党进入了改革开放新时期。经过拨乱反正,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随着我们党的事业的发展,在新时期的各个阶段,我们党反复强调党的群众路线工作和党的群众路线的重要性,并在实践中不断对其进行丰富和发展。这也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内容。

邓小平把群众路线和社会主义本质、改革开放的实践结合起来,他指出群众路线是我们的传家宝,要发扬党的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坚决反对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充分调动群众的积极性,要切实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水平,用“三个有利于”的标准来衡量我们党的工作。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群众路线给予了高度评价,把它作为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三个基本方面之一,是对马列主义的重大发展。《决议》在总结了几十年历史实践的基础上,对群众路线进行了高度提炼和概括,“群众路线,就是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必须“实行领导和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把群众的意见集中起来,化为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在群众的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如此循环往复,使领导的认识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

以江泽民为代表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深化改革,扩大开放。1990年3月,党的十三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决定》,从建立健全民主的科学的决策和决策执行程序、坚持领导干部深入基层和深入群众、加强廉政建设和党风建设、建立和完善党内外监督制度等七个方面,要求全党必须坚持不懈地努力加强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是对党的群众路线思想的新概括和新发展。2000年“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把党同人民的关系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三个代表”强调党的理论、路线、纲领、方针、政策和各项工作,必须坚持把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归宿,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在社会不断发展进步的基础上,使人民群众不断获得切实的经济、政治、文化利益。

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将党的群众路线与科学发展观、正确的政绩观、正确的人才观结合起来。要求全党要树立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群众观,要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是对党的群众路线观点的丰富;落实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树立为群众办实事、务实效、求实绩的政绩观;坚持人才存在于人民群众之中的人才观。

2012年11月15日习近平在《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要突出抓好六个方面工作》中又对党的群众路线进行了深刻阐述“我们要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时刻把群众安危冷暖放在心上,及时准确了解群众所思、所盼、所急,把群众工作做实、做深、做细、做透。要正确处理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现阶段群众共同利益、不同群众特殊利益的关系,切实把人民群众利益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

十八大后,习近平总书记和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围绕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在全党深入开展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切实加强全体党员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和党的群众路线教育,进一步正风肃纪,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主义。这是新形势下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重大决策,是顺应群众期盼、加强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的重大部署,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重大举措。

综上所述,群众路线是在革命战争年代产生的,是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实践中丰富完善的。我们党在九十多年的奋斗历程中,不断从立场、方法和作风内在统一高度丰富发展了群众路线,把它上升为党的生命线和实现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的根本工作路线。搞革命需要坚持群众路线,搞建设需要坚持群众路线,搞改革开放需要坚持群众路线。当前,我们全面深化改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更需要坚持群众路线。

(作者单位:市委党史工办)

责任编辑 邱仕明



东海县西朱范村

——山东整风运动的发始地

王晓华

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同志出席中央党校开学典礼，并作《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8日，中宣部和中央出版社联合召开宣传工作会议，又作《反对党八股》的演说。这两篇重要历史文献的诞生，既是发动全党整风的动员报告，同时，也标志着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延安整风运动，在全党范围内，由点到面进入到普遍整风阶段。山东抗日根据地的整风运动，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展起来的。西朱范村（现为东海县管辖），正是这场整风运动的发始

地。

西朱范村的开学典礼

1942年6月8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出《关于在全党进行整顿三风学习运动的指示》，要求各地相应开展整风运动，从而将整风运动由延安推向全党。根据中央部署，山东整风运动随即如火如荼展开。

7月16日上午，山东省临沭县西朱范村（现属东海县管辖）王得胜家的大花园里，书写着“山东整风中心学习组开学典礼”字样的横幅张贴在主席台上方，在烈日的照耀下格外醒目。主席台下，来自山东分局、省战工会、八路军115师及滨海区的党政军主要领导负责人齐聚一堂，有序就座，共同出席山东抗日根据地整风中心学习组的开学典礼。整个会场热烈活泼，庄重严肃。

参加会议的有山东分局书记朱瑞；115师代师长陈光、政委罗荣桓、参谋长陈士榘、政治部主任肖华；山东纵队政治委员黎玉等各级党的主要领导干部，共计四十余人。时在山东抗日根据地指导工作的刘少奇同志，作为中心学习组特邀学习指导员，也应邀出席。

“同志们，我们现在开会了！”分局书记朱瑞端坐在主席台上主持会议：“为了自上而下地积累经验，



毛泽东的报告《反对党八股》





1942年,肖华(左二坐者)在西朱范村学习整风文件

推动全滨海全山东党内外干部的整风学习,分局委员会决定首先从分局一级党政军民领导机关中的主要干部着手,建立中心组,进行整风学习。今天就是我们中心学习组的开学典礼!”

一阵热烈的掌声过后,朱瑞从为什么要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如何开展整风运动,在整风运动要注意什么问题等几个方面,作长篇报告。对中央指定的22个整风文件,朱瑞强调指出,每个同志都要开始有系统学习二十二个文件。这些文件是共产国际和我们中国共产党多年斗争经验的结晶,它包含着极丰富的宝贵的内容,我们必须认真的深刻的研究它,决不能草率从事。我们要掌握文件的精神与实质,来检讨自己的思想工作和历史,逐渐把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方法变成我们每一个干部的行动方针。

为把山东整风运动扎实有效,不走形式地开展起来,在此次会议上,山东分局按照中央整风模式,成立了中心学习组,以此来指导山东各抗日根据地的全面整风。

中心学习组由分局机关、师部、师政治部和战工会的主要干部四十人组成。各具体单位设分组,有正副组长。为统一中心学习组的领导,在分局委

员会领导下,成立学委会,朱瑞为学委会主任,委员有朱瑞、肖华、陈士榘、赖可可、陈沂五同志组成,下设秘书一名,负责联系各分组,推进日常的学习。学委会的工作职能是:规定计划、布置学习、检查督促、收集问题、组织讨论、座谈或专门报告,并不定期出版学习导报,介绍学习经验和心得。

根据山东一到夏秋农作物收获季节,青纱帐这一天天然掩体即倒,日寇又要大肆扫荡,干部不宜安心学习的实际,分局暂定学习时间为两个月,即自开学典礼之日起至九月十六日止。只有趁此日寇“扫荡”频率低的时期,才能集中力量进行学习,才能切实打下整风运动的基础。

在每天具体的学习时间安排上,因中心学习组的同志都是山东各级党政军的高级领导干部,政治理论水平较高,文化素养和理解能力较强,又都是各部门的主要负责人,工作任务繁重,也不利于集中学习。根据这一情况,分局对参加中心学习组的同志,在每天的学习时间上不作机械规定,由各组成员自己支配,以能完成学委会宣布的在一定时期的学习任务为原则。

开学典礼上,学委会在学习方法上作了几条重要规定:一是以中央指定的22个文件为研究对



象,一般不再指定其他参考材料。22个文件中,以毛泽东同志的《整顿党的作风》《改造我们的学习》《反对党八股》《〈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等六篇为最多,其他还有刘少奇同志的《论共产党的修养》、《论党内斗争》;陈云同志的《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等13个文件。但个别同志除精读22个文件外,时间与能力如均有余裕且必需参考时,须与学委会商量才能确定;二是要求各学员逐件精读并作好笔记,强调反省修正自己,要联系实际,反对以不正之风的态度去进行整风学习,反对书本主义和教条主义、始终围绕书本上打圈子;三是为了帮助一部分理解力相对较差的同志独立研究,各分组由组长负全盘领导责任外,得酌量情形,指定一位文化政治理论水平较高的同志为副组长,对其经常性帮助学习;四是求密切联系实际,强调分组讨论,每周至少一次,时间由各分组自行规定,形式不拘,力求活泼深入。每次讨论后,应向学委会汇报,并反映疑难或争论的问题,全组讨论会时间不作规定,由学委会根据具体情况决定实施;五是每一问题研究后,即举行测验,最后举行总考试,内容均侧重自我检讨。

刘少奇即席演讲

临近中午,朱瑞的报告方才结束。随之又殷切邀请学习指导员刘少奇同志讲话。刘少奇从下面的板凳上安详地站起来,边走向主席台边诙谐地说:“讲些什么呢?事先也没有通知我讲的问题呀!”一句话把所有在场的学员都逗笑了。

最终,刘少奇同志采取学员提出问题,他讲答的方式,作了一次极有意义的即席演讲。

关于读书看文件的态度和方法,刘少奇指出,读书看文件是一种必要的学习方法,能使我们获得知识,获得理论。但只是学习方法之一,而不是全部,只是必要的学习方法而不是主要的学习方法。主要的是什么?是实际斗争。因为知识或理论是从实际斗争中即从社会生产和革命斗争中产生出来的……一切都从主观上去找,把学习看作“茅山学法”,不是眼睛向下重视实际,承认物质第一,而是昂首望天,鄙视实际,承认精神第一,以这种态度和方法去进行学习,对待工作,结果必然走向教条主义的道路。

关于整风文件如何深入研究的问题,刘少奇说,这两种读法,一种是粗读,另一种是精读。粗读很容易,不必多谈,精读的方法主要是仔细研究,每一文件至少要读三遍。第一遍概括地了解其大意;第二遍还要逐句逐段精研细嚼,将每段的中心意思归纳起来,写在书头上,第三遍要掌握其全部实质。我自己看重要书籍和文件的方法,一般是如此。但有时也不止三遍。二十二个文件,多看几遍是有益无害的,愈多读愈了解得深刻的东西,如共产党宣言、联共党史,那非三两遍所能完成。为了具体证明这种读法,从实际上去帮助学员们的学习,刘少奇同志还翻开整风文件特辑,抽出几个文件,进行细致解释。

关于这次整风学习,刘少奇又指出,整风学习必须克服主观主义与教条主义的态度和方法,读书看文件是必要的,但更应结合实际斗争,注重调查研究,解决实际问题,做行动上的唯物主义者。同时指出工农分子应加强理论学习,克服狭隘经验主义。

刘少奇同志一个多小时的即席演讲,体现出了他高超的理论修养和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他那极富个性的演说魅力,深深打动了每一位在场学员,给他们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时已过午,整个开学典礼在热烈的掌声中宣告结束,长达五个多小时。

自此,山东整风运动自上而下逐一向全省范围内铺展开来。在之后的山东整风、审查干部、锄奸等一系列重大运动过程中,以罗荣桓和肖华为首的山东分局,正确把握了党的思想舆论导向,坚持从实际出发和实事求是的原则,有组织、有计划地领导干部进行整风学习,并结合整风进行审干、锄奸,从而保证了山东党的整风运动健康向前发展。山东整风的成绩和许多做法也得到了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充分肯定。

(作者通联:东海县南辰开发区管委会)

责任编辑 邱仕明



祝其国与祝其县溯源

孙 铭



赣榆古城遗址

今江苏省赣榆县西部的班庄镇古城村，南傍石梁河水库与东海县相毗邻，西濒凉泉子河与山东省临沭县隔河相望。全村现有人口 4200 人，为目前全县大村之一，因村西北角有一座古城遗址而得名。现在大多认为此城址为周朝祝其国与两汉时代祝其县故城旧址，但有的学者认为祝其故城在今赣榆县西北的夹谷山附近，两地虽均在赣榆县境内，但南北却相距约 15 里。同时，古今学者，又围绕祝其之名的由来，齐鲁会盟于祝其之夹谷山等问题争

议分歧很大。还原这段历史，澄清这些历史疑案，对于弘扬地方古文化，打造地方人文名片，文明兴县乃至文明兴市无疑具有重要意义。笔者不揣浅陋，略陈己见，以就教于方家。

“祝其”溯源

“祝其”渊源。《山海经·大荒东经》载：“东海之外大壑，少昊之国。”史学家分析我国东部的山东半岛及今海州湾区域的今连云港市，史称东夷，应为少昊之墟。少昊是东部沿海地区氏族部落想象的祖



先,他们以鸟为图腾。春秋时代的郯子(郯国在今山东省郯城一带)说少昊是他的祖先,名鸷。《左传·昭公十七年》载:“秋,郯子来朝,公于之宴,昭子问焉,曰:‘少昊氏鸟名官,何故也?’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黄帝氏以云纪,故为云师而云名。炎帝氏以火纪,故为火师而火名。共公氏以水纪,故为水师而水名。太昊氏以龙纪,故为龙师而龙名,我高祖少昊鸷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少昊氏以“鸟名官”,有凤鸟氏、玄鸟氏、伯赵氏、青鸟氏、丹鸟氏、祝鸠氏等,这些全是鸟的名字,共二十四种,当是二十四个氏族。其中的祝鸠氏,又称祝其。因为今赣榆县之地西距郯城不远,正属于传说中少昊部落所在的范围,可能是少昊的后裔祝其氏族定居于今赣榆西部,便将所居住之地称为祝其。

西周“武王追思先圣王,乃褒封神农之后于焦,黄帝之后于祝”(《史记·周本纪》)。《汉书地理志汇释》:“祝其,【补注】先谦曰:《周纪》,封皇帝后于祝。服虔曰:‘即祝其。’”此“祝其”即指今赣榆县西部。据此,祝其国系为周武王封皇帝之后裔而建。可见祝其国由氏族之名而来。祝其国在春秋初,仍为诸侯国,疆域包括今天江苏省赣榆县和东海县的部分地区及山东省临沭县部分村镇。国都位于今江苏省赣榆县西部班庄镇古城村。春秋末期祝其国属莒,后灭于齐。西汉于其旧址设祝其县,属东海郡管辖,后汉因之。晋仍保持祝其县建制,属东海郡。南北朝,南朝宋元嘉年间(424—453年),裁废祝其县。唐武德四年(621年),恢复祝其县建制,属海州。唐武德六年(623年),并新乐入祝其县,仍隶属海州。唐武德八年(625年),撤销祝其县建制,并入怀仁县(今赣榆县),从此祝其县之名消失而成为历史地名。1992年在东海县尹湾村发现汉墓出土的简牍中有“上计簿”木牍,其中出现的“祝其”就是“祝其”,古文“祝”又写作“祝”,“祝”、“祝”属于通假字。

另外,又由“祝其”之名衍生出一些与之相关的地名,如在祝其国(今赣榆县西)地域内的竖旗山,因之而得名为祝其山(海拔225米)。因此,祝其国之名源于祝其山的传说,实为本末倒置,不足为信。发源于祝其山的祝其河东流入海,即为现在

的老朱稽河。祝其河为何变成“朱稽”河?恐为从事水利、地名或续志方面的人误写。今赣榆县城西镇“朱堵”村是因在庄前堵塞祝其河蓄水而得村名,应为“祝堵”村。

“夹谷”风云

祝其国系西周至春秋时代的一个诸侯小国,却因一次政治会盟在其境内的夹谷山举行,而于中国历史上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和教育家孔子的名字联系在一起而闻名于世。

然而,要搞清楚“祝其”与“夹谷”之间的联系,还要从“齐鲁夹谷会盟”说起。《春秋·定公十年》载:“十年春,王二月,乃齐平。夏,公会齐侯于夹谷。”《春秋左氏传》载:“十年春,及齐平。夏,公会齐侯于祝其,实夹谷。孔丘相。”上述《春秋》又称《春秋经》为孔子所修;《春秋左氏传》(简称《左传》),司马迁与班固都认为此书是孔子同时代的鲁国大夫左丘明,为解释《春秋经》而作。但有人说《左传》是东周人或战国时人所作。总之,不管《左传》是何人何时所作,但称这部书为《春秋》的最佳诠释并不过誉。《春秋》写“公会齐侯于夹谷”,如果没有《左传》:“公会齐侯于祝其,实夹谷”之记载,人们就无法知道夹谷究竟于何处。上述二者所记综合起来其义乃明,即鲁定公十年春天,鲁国同齐国讲和。夏天,鲁定公和齐景公在祝其会盟,实际在祝其境内的夹谷,孔子担任侯相。今赣榆县境内的夹谷山在祝其故城东北15里,两地虽距离很近,但不是一地,正于上述史料所记相符。

夹谷,即指位于今赣榆县西北境的夹谷山,主峰海拔304.9米。夹谷山南面紧靠马山,两山之间夹着一道大山谷,夹谷山以此而得名。大山谷俗称鹰愁涧,涧北即夹谷山南坡,顺山势东西各有一道山梁,中间山坡平缓,呈簸箕状。公元前500年(鲁定公十年,齐景公四十八年)夏,齐鲁于此会盟。然而,这完全是一次齐强鲁弱的政治会盟。在会盟现场两军对垒,剑拔弩张。孔子不畏强敌,大义凛然,历阶而上,揭敌谋,斩侏儒,却莱兵,罢宴享,巧妙地粉碎了齐国在会盟现场及于宴会中劫持鲁侯的图谋,并迫使齐侯主动归还以前所侵占鲁国的土地,为鲁国赢得这场外交斗争的完全胜利,树立了以弱胜强的外交典范。从此,夹谷山因孔子莅临而成为



“圣地”。《夹谷圣踪》为明代所定“赣榆八景”之首。唐宋以来,许多文人雅士来此吟咏,留下无数千古佳名。明嘉靖年间大理寺正卿裴天佑(今赣马镇人),曾以《夹谷山》为名题诗一首,全诗如下:

翠薇西近祝其城,齐鲁当年此会盟。

幽洞云深人已去,左坛松老月还明。

却兵余焰遗空谷,罢享流风动废营。

我欲登临寻胜迹,开尊东麓听啼莺。

清代夹谷山又以“夹谷莺啼”之胜名,列为“赣榆八景”之一。夹谷会盟遗址占地面积数十亩,现存明代“圣化亭”遗迹石阶坡段残基 10 余层,最长约 7 米,最高约 5 米;“孔子相鲁会齐侯处”石碑一通(2.19×0.8×0.225 米),明万历四年(1576 年)立。1987 年 12 月,赣榆县人民政府公布为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3 年 3 月,连云港市人民政府公布为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祝其城地望。《汉书·地理志》载:“祝其,《禹贡》羽山在南,鲧所殛。莽曰犹亭。”其次《后汉书·郡国志》载:“祝其有羽山,春秋曰祝其,夹谷地。”又载于北魏酈道元《水经注》:“游水又北迳祝其县故城西。游水是淮水在赣榆县境内一条支流,其河道枯竭已久,它发源今涟水县南数里的废黄河槽(淮水故道),逶迤北流,经海州入东海县东北至赣榆县西南境,历经羽山西、利城故城东(今山东省临沭县蛟龙镇利城村)、祝其故城西,又东北经计斤故城(今赣榆县塔山镇土城村)西、赣榆故城(今赣榆县海头镇盐仓城村)北,又东北经古纪郭城(今赣榆县柘汪镇东林子村东海面水下城)南入海。综上可知,祝其县治所位于游水东岸,羽山(位处今东海县北与山东临沭县交界处)之北。《大明一统志》载:“祝其城,在赣榆县西五十里。”《嘉庆海州直隶州志》及赣榆旧县志皆依其说。《太平寰宇记》称祝其,汉县名,“故城在临沂县(今为临沂市)治东南五十里。”《晋太康三年地记》载:“故祝其城在郯东九十里。”今赣榆县班庄镇古城村西北角的古城址近方形,每边长约 500 米,北墙已圯,其余三面尚存,从断面上可看到夯窝。城内土灰色,有绳纹筒瓦、陶罐陶缸等残片,经南京博物院专家考证为汉代古城。该村西与山东临沭县境仅一河之隔,南有羽山相距约 40 里,西距山东省郯城县 90 里,西北与山东省临沂市相距 50

里,东与赣榆旧城(今赣马镇城里)相距 50 里。古城村的汉代遗址所在位置正与上述史料所记方位相当,里数相符,所以,祝其城当在古城村。目前,祝其故城遗址为连云港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然而,根据“公会齐侯于祝其,实夹谷”的史料记载。杜预《注》:“夹谷即祝其也”,服虔曰:“地二名。王莽更之曰犹亭。”据此所论,祝其与夹谷便成为一地二名。受其影响,《中国历史大辞典·历史地理卷》载:“祝其县,西汉置。治今江苏赣榆西北夹谷山附近”,谭其骧先生所著《中国历史地图集》也将祝其县治所标于夹谷山处。综上所述,均表明祝其国都城及祝其县治在赣榆县东北的夹山附近。

但是,上述推论并无实据,实为对《左传》原文误读所致。笔者认为,《左传》所说的“祝其”在西周时为祝其国,春秋末祝其国成为莒国属地,汉时为祝其县,所表示为一国家组织或一级政区组织,并非指“祝其城”一地,其中“夹谷”为祝其境内的一座山,“祝其”与“夹谷”为属、种两个不同概念,祝其国(县)包含着夹谷之地,二者不可混淆。因此,所谓齐鲁“会于祝其,实夹谷”正确解读应为:两国会盟于祝其,实际在其属地的夹谷山上。服虔将“祝其”界定为“祝其城”,并于“夹谷”混为一谈,所以才会推出一地二名之说,造成逻辑混乱。况且,王莽所更祝其县名,无法将“夹谷”一名改为“犹亭”一名。

综上可知,祝其国都城与祝其县治均在赣榆西五十里的古城村,夹谷山在祝其东北 15 里。两地近在咫尺,实为两地,均在今赣榆县西部的班庄镇境内。

“盟地”之争

齐鲁会盟的旧址,是史学界争论已久的问题。史籍注论颇多,意见各异,至今仍在争论中。

《史记·齐太公世家》载:“(齐景公)四十八年,与鲁定公好会于夹谷。”【集解】服虔曰:“东海祝其县是也。”《通典·卷第一百八十》东海郡海州怀仁(今赣榆):“有夹山,即夹谷,齐鲁会处。”以上史注均主张齐鲁夹谷之会于今赣榆县境。

然而,清初学者顾炎武认为上述史注都靠不住,遂提出:“赣榆在春秋为莒地,与齐鲁之都相去各五六百里,何必若此之远。当时景公之观不过遵



海而南,放于琅琊而已,未闻越它国之境。”

顾氏上述否定齐鲁夹谷之会在今赣榆之境,大致可归结为三点,一是赣榆距齐鲁之都各五六百里,与此会盟有乖史实。二是越它国(莒国)之境会盟不合常理;三是莱人进入今赣榆之境,路程太远,兵劫鲁侯似乎不可能。现就此逐一考证之。

关于会盟地距国都之远近之证。春秋时代,齐鲁为相邻的东方大国,为争夺国土和利益,两国之间战争不断,但又战中有和,双方会盟谈判多次,会盟处多于两国边界,而不以距国都之远近定地点。如鲁隐公十年(公元前713年)春,公会齐侯、郑伯于中丘,中丘属鲁地,在今山东省临沂市东北;鲁桓公十五年(公元前697年),公会齐侯于郕,郕属齐地,故地在今山东省蒙阴县北。鲁庄公九年(公元前685年),公及齐大夫盟于暨,暨属鲁地,故地在今山东省枣庄市东南。上述各次会盟之地距今赣榆之境较近,尤其临沂市之东北距赣榆西北之夹谷山不足50里,齐、鲁两国都能远离国都到这些地方莅会,又因何不能到赣榆之夹谷会盟呢?而且,春秋末,赣榆之境虽属莒地,但其地临鲁国东南界,与齐国南界相接,于此会盟是说得通的。

关于越它国之境会盟之辩。《水经·淮水注》载:“游水左迳琅琊计斤县故城之西。《地理志》曰:莒子始起于此,后徙莒,有盐官,故世谓之南莒也。”上述所说的游水所经的汉琅琊郡计斤县旧址在今赣榆县塔山镇驻地土城村,土城至今尚存。但此地又为春秋三都之一的渠丘,因莒子起于此,世谓之南莒。现该镇的尚有大、小莒城村,传为莒国的初都。北京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尹钧科所著《春秋莒国三都疆域略考》一文中说:“怀仁(今赣榆)之莒城实在莒国南境,当即渠丘,因曾为莒国之都,故以‘莒城’之名留传至南北朝时期。”据此,春秋末今赣榆之境确为莒国之地,祝其属莒邑,北与齐鲁两国相邻,但莒国弱小,齐鲁两国以强凌弱,经常无端侵入其境内。因此,齐鲁两国政治会盟放在对双方均不构成任何威胁,而且又临近两国边界的第三国的莒国之地会盟,应该是双方都能接受的。

关于利用莱人以兵劫鲁侯之说,见于《左传》记载:“犁弥言于齐侯,曰:‘孔丘知礼而无勇,若使莱人以兵劫鲁侯,必得志焉!’”犁弥所指之莱人,是否

为莱芜之人,值得研究。《禹贡》载:“莱夷作牧。”胡渭著《禹贡锥指》云:“今登、莱二府,皆《禹贡》莱夷之地。《左传》夹谷之会,莱人欲以兵劫鲁侯。孔子曰:‘两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乱之’。莱之为夷无疑矣。先儒但以为地名,非也。”《史记·齐太公世家》【集解】杜预曰:“莱人,齐所灭莱夷。”今山东省黄县东南有莱子城,即古莱国。“周灵王五年(公元前567年),齐灭莱,莱是山东半岛上一个东夷大国,齐地因之扩大了很多(《中国史稿》1976年版)。可见夹谷之会所提莱人,不是单指莱芜之人,而是泛指“莱夷”。笔者认为,使莱人以兵劫鲁侯,即指齐侯派遣由“莱夷”之人组成的武装人员(即莱兵)劫持鲁侯。可见,利用莱兵随军参与祝其之夹谷会盟,虽路途稍远也并无不可。

顾氏在否定夹谷之会在今赣榆境的同时,又说:“及读《金史》云:‘淄川有夹谷。’《一统志》云:‘夹谷山在淄川县西南三十里,旧名祝其山,其阳即祝其会盟之地。’《水经注》:‘萌水出般阳县(今淄川)西南甲山’,按此,则《金史》之夹谷山,即《水经注》之甲山。而《莱芜县志》则又云:‘夹谷在县南三十里,接东泰界’,二说皆未知何所据。但在莱芜则正当齐鲁之境。”综上顾氏对“夹谷会盟”之地又提出两说,一为淄川说,二为莱芜说。然而,《金史》所说淄川境内的夹谷山,又名祝其山,《水经注》认定为甲山。可见淄川境内之夹谷山或祝其山,不是误称,也是与赣榆之夹谷山、祝其重名。况且,淄川为齐内地,距鲁都城甚远,在齐强鲁弱的情况下,于此会盟是鲁国断不能接受的。另考证莱芜之夹谷,实名为夹谷峪,且境内并无祝其。由此可见,齐鲁夹谷之会于“莱芜说及淄川说与史实皆不符”。

综上所述,今赣榆县西北的夹谷山南麓山坡之上,与史实相符,当为鲁定公十年(公元前500年)齐鲁会盟之处。《中国历史大辞典·历史地理卷》与《中国历史地图集》,虽然,认定祝其城在赣榆西北的夹谷山附近有误,但是实际却已认可齐鲁夹谷之会在今赣榆县境内。

(作者单位:赣榆县民政局)

责任编辑 张伟敏



史迹斑斓 大义村

——《寻古云台十八村》之二

伏广喜 张茂田

从当路村向北 3 公里,便进入花果山街道办事处大村。该村亦入“云台十八村”之列,排在当路村后。但在“云台十八村”名册上,不叫大村,而叫大义村,亦称兑村。大村是其俗名。传说是讲仁义的地方,因之得名。

大义村有着悠久的历史,可说是到处都有斑斓的史迹。1960 年,在兴建大村水库时,发现大村遗址。省文物工作队作探沟发掘,出土的陶鼎、陶杵、陶轮、石斧等等,与二涧村遗址相同,早于山东大汶口文化,属新石器时代早期,为 7500 年前遗物。1978 年 7 月,花果山砖厂出土一批破碎的汉代简牍,可辨的有 13 片。它清晰的记载了汉代大村地区所设置的里(县以下行政单位)名:荣成里、西长里、宣梁里、永昌里、衙满里、利成里。从以上两次考古发现得知:早在新石器时期时,这里就形成部落;西汉时,这里已有“里”建置,而且人口较为稠密。



清《云台山志》大义村图

清乾隆以前的现花果山街道地区,只有当路、大义、小村 3 个村。其时的大义,除现新华、当路、小村外,其余的像今天的新村、前进、前云、飞泉、花果山居委会乃至今天的花果山风景区等皆在其辖内。其时,这里是当时海州地区古宗教场所最集中的区域之一。山上山下,寺、观、庙、庵、堂、院一座连着一座,是大义村斑斓史迹中最耀眼之处。那用碎石叠摞的斑驳的墙体、那灰黑色的小瓦、那古色古香的飞檐翘角、那几进几出的院落,无不彰显着云台山地区古老的文明和劳动人民的智慧。据统计,明清时期,分布于大义村界内的古宗教建筑有 60 余处。其中,山上,以三元宫为代表的建筑群,号称“三十六房头”,早就



有“淮海第一丛林”、“天下名山寺院”之誉。山下,以大村水库为中心,也有 20 余座。

大村水库之东的海清寺是一座非常古老而著名的宗教建筑。从阿育王塔内东壁上《盛延德等记谒》中可以看到:天圣二年(1028 年),海清寺设供僧 850 人;天圣三年正月,海清寺设供僧 900 人。可见,北宋时期,海清寺可容纳僧人近千人,可见其时的海清寺规模之巨。到清乾隆时期,其时的《云台山志》记载该寺已“久废”。至光绪十二年(1886 年),该寺仅存正殿 3 间。1959 年 10 月重建大村水库,海清寺被拆除。大义村南的弥陀庵,又称地藏庵,俗称南庙,是过去海宁禅寺 36 房头到 24 房头中的一个房头,可见它是昔日三元宫管辖的重要庵堂之一,被称为三元宫下院。它是一所山门朝西的四合院,堂屋 5 间,南屋 5 间,东屋 5 间。因殿内塑有一阎罗像故名。清初,此庵就已荒落。嘉庆八年(1803 年),知州唐仲冕曾斥资重修。然 1937 年又遭日机轰炸。1949 年渐废,后为林场占用,最后辟为花果山政府办公用地。大义村地盘上的宗教建筑,年代最久的当数心净寺,从日本僧人圆仁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可以看到,唐开成四年(839 年)三月二十九,圆仁乘坐的 9 条船在今之高公岛靠岸。四月二十六,东海县(今南城)衙邀圆仁一行作客,就从心净寺路过。

明清时期,三元宫在海内有着广泛的影响,号称“烟火两万家”。时称到浙江普陀山进香为朝南海,而去云台山三元宫进香为朝东海。据说宝应人为到云台山进香,专门从中正至云台山前一线开挖一条河流,用于香客行船,故名烧香河。在康熙五十年(1711 年)前,云台山还浮悬海上,大义村是其唯一的进山通道。那就是说,香客烧香,必走大村。而一年烧香中最热闹的时日是正月十五香火会,从初一到十五,大义村热闹极了。前面介绍的弥陀庵,作为三元宫的下院,它的角色相当于

今天的接待站、后勤处。每年刚过大年初一,就开始忙着为香客办理登记、安排食宿等事宜。据山里的一些老人回忆,为烧头香,远道而来的香客不少在大年初一、二就启程到达弥陀庵。前、中、后云台山及邻县的香客在十二、十三两天必到。香会这天,从弥陀庵到老君堂、仙人桥、十八盘、茶庵一线,可谓人山人海。男女香客皆胸挂写有“朝山进香”的黄布袋并配有锣鼓开道。领头的,举着多面绸制的进香锦旗,后面的人抬着整猪整羊,燃放鞭炮,浩浩荡荡的朝前推进。那令人振奋的场景,恐怕比今天的苍梧绿园元宵灯会要隆重得多。

与宗教建筑相映成辉的是大义村的自然、人文景观,同样闪烁着历史的光芒。大村水库东南有郁林观旧址。早年,这里是古海州地区著名景观。该景观开发于唐开元初年(713-720),时任东海县令元暖亲自勘察规划,在飞泉源头垒石蓄水,使其潺潺不绝。据李普元的《东海志》载:“此观名胜有狮子岩、濯缨泉、埋云石、喷水崖、朝霞壁。”时“古木阴森,名花交映,为东海胜境。”最珍贵的是,这里的巨石上、岩碧间分布着众多摩崖石刻,素有小碑林之称。整个石刻有 17 处之多。最著名的是唐隶和宋篆



现在的大村(卫星地图)



二刻。唐隶即《题东海郁林观壁记》，为唐开元七年（719年）海州司马崔惟子崔逸撰文，记叙了崔惟父亲和东海县令元暖等一行游玩的行程及这里的风光。这面隶刻净面高2米，宽约5米，字径3寸，计393字。虽文、书均无款，却是我省最有名的唐代石刻之一。早在宋代，金石家赵明诚及其妻、著名女词人李清照就将此刻收入他们的《金石录》一书中。在唐隶石刻的斜对面，有宋篆三言诗碑刻。由祖无择拟文，苏唐卿书篆，王君章镌刻。三人各展所长，被后人称为“三绝”名碑。该碑刻于宋庆历甲申（1044年）镌，距今已900多年。

没进大义村，在10多里以外就可见一座高耸的古塔矗立于对面的青山下。它是大义村的标志性建筑，已有上千年历史。这座古塔的名字叫大村海清寺阿育王塔。从镶嵌在该塔西壁的《海清寺塔柳峦记谒》中得知，此塔建于北宋天圣元年（1023年），由柳峦等27人牵头，发动千余施主每人集资100文兴建。但从这一碑记另一行文字中可看出，此处唐朝已建塔：“此塔镇在海城灵基山东南角，大唐第二至尊。”这“大唐第二至尊”沉甸甸的6个字，已将此塔的兴建历史推至唐朝。而据唐伯元的《游青峰顶记》石刻载，此塔“起梁宋间”。这个梁，指五代十国时的后梁，也比宋天圣元年要早一个朝代，年代也早100多年。此塔9级8面，高40.58米，是苏北地区现存历史最悠久、塔体最高的古塔。近千年来，连云港地区发生大小地震18次，大村海清寺阿育王塔始终安然无恙。

海清寺旁的大圣湖，也是一处绝妙的风景，与海清寺塔正好形成湖光塔影绝佳效果。而在上世纪60年代以前，是没有这个人工湖的。1959年，市人民委员会为了解决前云台山西、北部分农村灌溉和排涝问题，决定在当时的大义村鸡鸣山至狮子山之间建一座当时全市（此时不含现四县）最大的水库。在完成对库区温水河、赵巷、薄巷、蒋巷、东小寨等7个自然村落搬迁之后，云台（区）人民公社（含现花果山、朝阳、中云、云山、宿城）每天投入上万名劳力奋战在水库工地。市人民委员会也调动下属机关4000余人到工地与农民一起奋战。同时，调集25种，228台套机电设备投入水库建设，1960年7月，首期大坝、溢洪道、灌溉涵洞等主体工程完成。

王朗石剑、陈光蕊墓、老君堂遗址、唐王坝等等也是有着相当历史文化内涵的景观。然而，随着时光的推移，我们大多只能从史料中去寻找了。

与当路村一样，大义村清初以前也是“民灶杂居”。境内时遭海潮冲击，历史上曾两次筑堤“上灌山水，下捍海潮”。一是在洪武元年（1368年），在现政府驻地筑起一座长5丈的石闸“横截石涧”，史称金水坝。然明成化年间（1465—1486年）被海潮冲垮，今无存。二是在明万历元年（1573年），在村“西北官路”筑大村堰，由州判唐伯元斥资兴建。明嘉靖十八年（1539年）原址在徐渎浦的徐渎盐场迁往该村铺新滩产盐。然到清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由于千余面盐池荒废，被迫全面放弃。

晚清年间，大义村出了一位全国知名的书法家，与其时张伯英、齐白石、傅抱石等书画家齐名。他叫章兰溪，生于同治十二年（1873年），卒于民国五年（1916年）。

光绪年间废科举，章兰溪以扎实的功底考取南京师范学堂。毕业后，被留校任教。1911至1914年，章兰溪调任湖南岳麓师范学院、吉林建筑师范学校。不久，又转调北京京师大学堂。很快，他的名字在京城被叫响，商号、唐号、店牌、门联以得章书者为荣。就连皇宫也曾请他去书写匾额。1915年，袁世凯称帝，强命章兰溪为其书写“宪法”章兰溪无可奈何，对天长叹，忍怒竟日书写。其书完成后，气闷抑郁，致而咯血，一年后溘然长逝。享年43岁。

章兰溪留在家乡的书法作品，目前可知的只有宣统二年（1910年）刻于花果山照海亭北壁的《云台山海天洞缘起纪略》。其刻高0.45米，宽1.15米，1034字，竖书，小楷，是一幅难得的艺术精品。

（作者通联：新浦区郁洲南路景山秀水2期C5栋）

责任编辑 张伟敏



寻找消失的 许家大院 (下)

许重瑾

(接上期)

“二许”故居——东大街“旗杆许”

说“二许”故居,就得提他们的父亲许兆升,为官几十年,兢兢业业,一世英名,最终却因运河堵塞而削官,并罚白银一万二千两而致家赤贫,并软禁苏州九年。许桂林在《北堂永慕记》中叙说了此事,《嘉庆海州志》人物列传中记载:

许兆升,字登三。其先歙人,顺治初迁板浦,为海州人。……乾隆辛丑,洪泽大涨,以抢护功议叙调运河通判,缘事镌级,督河疏言河上人才难得,复其官,改发东河。因前浚运河分陪万二千金,部议籍产,乃赤贫。嘉庆元年,被旨豁免,遂归。卒年七十有四。

受父亲和家学的影响,许乔林、许桂林兄弟从小聪明好学,博览群书,最终著作等身,桃李天下,成为江淮大家。对海州历史稍有了解之人几乎无人不晓,他们对当地历史文化的贡献无人能越其右。当时海州盐运分司通判谢元淮曾评论许乔林:“江淮以北,凡金石文字,必得先生手笔为光宠。其人品如蝉如鹤,风露之清,洁然易饱;九皋之鸣,自闻于天。名位不崇,而时望所属,人无异词。”钱塘著名书画家钱泳曾作画题诗赠与他:

品节文章泰岱高,春风海上幸相遭,
先生不住栽花手,课罢桑麻种李桃。
数间楼阁面山开,载酒人因问字来。
多少红尘飞不到,著书终日对云台。

《清史稿》儒林传载:

许桂林,字同叔,海州人。嘉庆二十一年举人。桂林于诸经皆有发明,尤笃信谷梁之学,着《春秋谷梁传时日月书法释例》四卷。其书有引公羊而互证者,有驳公羊而专主者。阳湖孙星衍尝以条理精密、论辩明允许之。又着《易确》二十卷,大旨以干为主,谓全易皆干所生,博观约取,于易义实有发明,别有《毛诗后笺》八卷,《春秋三传地名考证》六卷,《汉世别本礼记长义》四卷,《大学中庸讲义》二卷,《四书因论》二卷。尝以其余力治六书、九数,着《许氏说音》十二卷,以配说文。又着《说文后解》十卷。又以岐伯言“地,大气举之”。气外无壳,其气将散;气外有壳,此壳何依?思得一说以补所未及。盖天实一气,而其根在北,北极是也。北极不当为天枢,而当为气母。因采集宣夜遗文,以西法通之,着《宣西通》三卷。又以算家以简为贵,乃取钦定数理精蕴,撮其切于日用者,着《算牖》四卷。生平所著书四十余种,凡百数十卷。甘泉罗士琳从之游,后以西算名世。

关于他们的事迹,《连云港市志》《灌云县志》均有列传,这里就不



多叙说了。“二许”故居也是著名的许家大院之一，称为“南大门许”或“旗杆许”，许家世代业盐，各家均有商号，南大门名为“恒裕”，是后来有名的垣商。

“二许”故居始建于嘉庆至道光初，它北至东大街，南至鱼市口，面积约 4000 平方米。因许乔林、许桂林为举人，在门前竖有“旗杆”。所以后人也称南大门为“旗杆许”。大院为三进，其中有厅堂、居室、前花园、后花园、西花园等建筑；后院北首为二层楼房，上层四间名曰“藏书楼”，当时藏书甲于海州；楼下当中两间为“会文厅”，乃“二许”昆仲与文友谈经论诗之处；东厢为许乔林书房，名为“弇榆山房”。西厢为许桂林的书房，起名为“琴想山房”。

许乔林生征耀、征容二子；许桂林无嗣，以征容为继子。此后两门人丁兴旺，遂成板浦许氏的代表——“旗杆许”。“燕翼堂”匾就挂于“旗杆许”大堂。

许征耀，号小石，廪生，嘉道年间海州学者，助编《海州文献录》《云台新志》《胸海诗存》《确易》等书，子三：牧生、秀生、宝太，其中牧生为拔贡生，授教谕，其兄弟均为诸生。

许征容，号小月，附贡生，嘉道年间学者，助编《海州文献录》《云台新志》《确易》等书；子四：宝生（宝豫）、怀生、茂生、稼生；其中许茂生，名桐，贡生，光绪初授句容县教谕，是著

名学者许绍蘧的祖父。其弟兄也均为秀才。

1938 年 5 月 20 日，日本飞机连续四天轰炸了板浦，“二许”故居被炸平，只剩下许绍蘧写作《连云一瞥》时的三间小堂屋，“二许”的珍贵资料和藏书大都损毁。目前，故居仅有的 300 平米小院，为许绍蘧之侄许广新家人居住，大门口的一对石鼓为原物，现政府正在此拆迁，“二许”故居的最后一点遗存可能已不在了。

许兆虎故居 —— 东大街“石鼓门”

大院在东大街北侧，与“旗杆许”相对，两者建造时间差不多，它是板浦当时建筑最高、质量最好的住宅。面积有 6000 平方米，北至东后街，东至马巷；大门前有两只石狮把守，门旁两只汉白玉的大石鼓雕功精美，远近闻名，俗称“石鼓门”或“北大门许”；进门有影壁，建筑为徽州宅院风格，四排房五进，前面有接待贵客的“五之堂”大厅，后面有祭祖的家祠“怀远堂”；还有对月楼、藏书楼、花园和花房。家人回忆，房屋的建筑质量好，用料讲究，门面和外露墙面都是磨砖到顶、糯米汁扣缝，房间四梁十二柱，大厅的木柱都在四十公分左右，房屋高大，墙厚顶厚，冬暖夏凉；天井有廊遮雨，地上均铺六十公分见方的石板，并有设计合理的雨水系统。因为地面原为淤土，做地基时很讲究，先是打入几千

根楠木梅花桩，在上面铺上普通石板，然后再放上碎石砖，铺上一米厚的经过水洗的黄沙，以防止盐碱地返潮。部分建筑材料还是从徽州等地运来。按徽州的风俗，大门不能正南朝向，所以门厅有意向东偏一点，给人感到很特别。

在日本飞机轰炸中，怀远堂等被炸毁。解放后人员逐渐外迁，到 1974 年前后全部搬迁完，现为板浦中学初中部。镇上许重琦、许重璐的一处房屋就是用拆掉的老宅材料重新翻盖的，能看见许多大条石、梁柱的基石以及原穿堂门口



已故许广新家门口的石鼓为二许故居遗物





原穿堂大门旁的石鼓

的一对石鼓。

北大门里住着许文宗孙许兆虎的后人。许兆虎，字啸山，许士楷次子，生雍正十二年，监生，一子许诏。《嘉庆海州志》载“由刑部司狱官至武定知府，有吏才。”《清史官员履历档案》有乾隆引见时的评语：“此人似可出息，但年少可慢用。内用山东武定府知府。”可惜因病逝于任上，年仅三十二岁；许乔林随父从苏州回板浦后，受从兄许诏宴请，特赋诗一首《修来堂宴集呈凤轩兄》：

迁此二百年，嘉树已合抱。
扶疏漏古月，一径辟深窈。
兄弟追昔欢，晚食共一饱。
家门说旧事，殊觉贫官好。
襃襃武定公，玉立伟仪表。
一麾初出守，青社称矫矫。
圣主方东巡，蹕路清尘早。
太守约束严，事办民不扰。
黄霸一丈车，所至花香绕。
才望冠台司，名实惬父老。
群期建绂节，诤意哭素旄。
当其病剧时，犹判发棠稿。
时霖甫酿春，可惜所及少。

吾兄守清白，堂构能勤绍。
我家礼法严，矩度循中道。
近来华衣裳，楚楚自颠倒。
或为叶子戏，对局穷要眇。
或命秦青歌，鸚鵡闹舌巧。
妨时兼害事，梦梦何时了。
从来荐绅裔，往往降舆皂。
能者养以福，世务贵通晓。
五世泽未遥，此堂庶长保。

（注：许诏字凤轩）

诗中叙说许氏家史并称赞了知府许兆虎仪表堂堂，为官清廉。乾隆南下时，接待安排妥当而不扰民，在病重时仍坚持上堂审案直至逝于任上。

许诏，字凤轩，配饶氏，子四菰、莲、蒸、芬；逝后，板浦盐大使李汝璜的孙子、官知府李维醇为其写传云：“少侍其父武定守于山左，通达经世之务。父卒于官，家以官贫公私累不貲，辛勤拮据，支拄门户者六十年，寿登八袞；凡州之善学，都赖以成。”许诏子与孙均授业于“二许”，两家关系甚为密切。

许菰，字秋源，即补员外郎，以防堵功赏戴蓝翎；夫人朱氏、计氏、陈氏、戚氏、刘氏、顾氏。子六，志仁、赓、荫、蕙生、庶、廩；许莲，字东田，贡生，曾入幕御史汪廷珍府，后官山东县丞，撰有《知白斋诗集》四卷，与从叔和老师许乔林多有诗文往来；许芬，字少霞，早冠童子试，其后好为幽隽之文，清道光五年应省试以疾归卒。撰有《芙蓉仙馆诗略》二卷；

许志仁，字子安，许乔林《弇榆山房笔谭》载：陶柳村曰：“哀哉！许子安之孝也。弱冠失母，如中路婴儿哭无常声，既祥琴而哀未忘焉。虽毁，不灭性而终以孝死。”《白云》一篇不忍卒读也。

陟彼胸山，瞻望白云。
白云英英，鸟飞失群。
反哺无从，涕泗漣漣。
虽有大椿，思我慈亲。
树静风多，栗栗棘人。



许鸿宾,字健云,许崧四世孙,板浦知名士绅,清末民初追随南通张謇、青口许鼎霖等人从事实业救国活动。担任过大源盐业公司经理及淮北盐业七分公司总经理。与水利专家武同举作为向导,协助外国专家勘测海州湾一带的水文资料,后与武同举撰《海州灌河口之评论》一文刊于《地学杂志》,可惜后来在新浦小海利用盐碱地开发棉田投资中未获成功,以致损失巨大。另外,许鸿宾是法起寺、东磊延福观、悟道庵等寺庙的大施主,现宿城悟道庵遗址还存有其书写的石刻:“别有洞天”、“德云常在”、“礼泉”、“老和尚洞”等,在壮年时病逝。现年已九十的上海瑞金医院的许曼音教授是其孙女。许曼音长子陈竺曾任卫生部长,现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连云港市国税局副局长许重伍乃笔者堂弟,也是此大院中人。



许鸿宾题写的宿城悟道庵石刻:“别有洞天”

怀远堂盐号用“德裕”,清末入股大源盐业公司,也是板浦著名的商号,所以此大院有时也被称

为“许德裕”,在外挂的灯笼上均有“德裕”二字。

许调故居——东大街同裕巷“义学许”

同裕巷的“义学许”——辉远堂,因拆除的早,现在知道的人已经不多了。在当时也是名声显赫的大院。辉远堂和燕翼堂是目前所知的板浦许氏最早的堂号,所挂的两块匾均由虎卧老人在康熙初所写。应属许宏宗和许文宗分别所有,是板浦许氏珍贵的遗产。辉远堂匾已无存,燕翼堂匾解放后还在,文革后有人发现此匾当门板使用,现不知在何处了。虎卧老人为明末遗老,埋名隐姓,号称五百岁,后几乎被视为神人,传藏其笔墨有护身辟邪之能。

辉远堂在东大街东段北侧同裕巷,“同裕”即此盐号。大院建造比怀远堂稍晚,规模也相当。住着文宗子许士佩的后代,因许调曾鼎力助建敦善书院,其宅靠近旁边,也称为“义学许”。

板浦许氏的家史,记录了当时社会的变迁。从明末至今四百余年家族繁衍兴旺,代有新人,这和先祖的教诲与厚重的文化是分不开的。许家大院虽已不存,但先人留下的精神文化遗产是值得我们后代传承的。我们在此也呼吁,古镇板浦文化底蕴深厚,人文资源丰富,应该挖掘和保护,如能建立“二许”纪念馆,对当地文化建设和人文教育是有益之事,也与李汝珍纪念馆形成呼应。据说板浦姚祥麟先生倡建的“板浦名人馆”已得到政府的重视,我们许氏后人也非常赞同,愿意配合并提供所藏的资料。

(注:文中引用了新浪博客“翻山客”先生的照片,在此向他表示谢意;南京许先生等许氏后裔为本文提供了一些详实的资料,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责任编辑 张伟敏



唐宋时期的 吕氏家族与海州

陈贵洲

吕氏在中国历史上枝繁叶茂,名人辈出。唐、五代时期,吕氏逐步发展壮大,进入两宋,吕氏家族达到了辉煌的顶点,涌现出了一大批彪炳史册的杰出人物。有趣的是,唐宋时期的吕氏和海州也结下了不解之缘,对海州地区的政治、社会、文化、宗教等都有过重要的影响。

一、唐代吕氏与海州

唐代吕氏与海州的渊源,最有代表性的无疑是吕让、吕洞宾父子,但是这个渊源却颇有戏剧性的成分。据《康熙海州志》卷四《治典》:“吕让,海州刺史。系洞宾之父,见《东游记》。”而记载海州史事最为详尽的《嘉庆海州直隶州志》卷四《职官》却不载吕让姓名,并且在卷三十一《拾遗四》中对其是否曾任海州刺史持怀疑态度,吕让是否做过海州刺史,遂成为一大谜团。1996年在河南孟津平乐乡吕氏后人处发现的吕让墓志,终使这一答案水落石出。

据吕让墓志记,吕让生于唐贞元八年(792年),卒于唐大中九年十月(855年)。父为吕渭,祖父延之,曾祖崇嗣。吕渭(734—800年)字君载,河中(今山西永济蒲州镇)人。唐浙东道节度使吕延之长子。唐肃宗元年间登进士,后擢升礼部侍郎,出任潭州刺史兼御史中丞,湖南郡团练观察使,后被赠予尚书右仆射,是代宗李豫年间的高级官员,在湖南执政多年。和夫人柳氏生子温、恭、俭、让。吕让“……二十三进士及第、解褐秘书省校书郎,以支使佐……改监察御史,襄行转殿中侍御史,赐绯鱼袋。罢除三原县令,改检校尚书,仓部员外郎,兼侍御史

……随表赴阙,授海州刺史,罢郡西归……改检校秘书少监,兼御史中丞……大中九年十月廿四日,弃养于归仁里之私第,享年六十三……归祔于洛阳邙山清风原大茔。墓志对吕让任官情况的记载,填补了《唐书》等正史之缺佚。尤为难能可贵的是,墓志较为详细地列述了吕让任海州刺史期间的主要政绩。因史书及墓志对吕让担任海州刺史的具体时间记载阙如,现以墓志推论,其任三原县令时为33岁,后经数次易职,始升任海州刺史,其间至少约2年,则其担任海州刺史的年代当在唐文宗大和(827—835年)年间。墓志云:“东海远皇都三千余里,承平不轨之后,人多不知法制,州无律令,无紫极宫。”“不轨”乃越轨、叛乱之意,当是指唐宪宗(806—820年在位)命楚州刺史李昕讨伐藩镇李师道,取海州、下朐山之事。面对长期和平之后的战争动乱、法制律令丧乱,社会动荡,连官方奉祀李唐祖先老子的紫极宫也遭毁坏的情况,吕让甫一到任,“则命备写而创置之,揭以碑铭,连境知教。去豪右,恤茆独,收葬枯骨一万余所,招复流庸五千余户。”收到了良好的效果,政绩卓著,社会安定,士民感戴,“清在人谣,著于州状。”公务之余,与贤达人士“间以酒饌,博弈诗句”,然而“赓行悉以奉钱,唯恐不至污俗”,始终保持清廉本色。于是海州大治,吕让也被海州士民亲切地称为吕海州。

吕让生有五子:煥、煇、煜、炫、烜。其第三子吕煜即妇孺皆知的八仙之一吕洞宾。《宋朝事实类苑》卷四十三《仙释僧道·吕先生》:“洞宾自言吕渭之



后,渭四子,温、恭、俭、让。让终海州刺史,洞宾系出海州房。让所任官,唐书不载。”吕煜又名吕岩。《河南府志》言:“吕岩,字洞宾,河中(今山西永济)人,海州刺史吕让之子也。”《列仙全传》卷六云吕洞宾“唐贞元十四年(798)四月十四日巳时生,因号纯阳子”;《古今图书集成·神异典》卷二四六:“吕真人《江州望江亭自记》云‘……唐末三举进士……年五十,道成’”。由此可知吕洞宾姓吕,名煜,又名岩,字洞宾,道号纯阳子,为吕让之子,后得道成仙。

吕煜是否到过海州,不甚明了,但因其在全真道中的崇高地位和其父在海州的巨大影响,海属人士普遍相信吕洞宾曾生活于海州,并广修庵观世代敬奉。《云台山志》等志书记载云台山金牛顶海曙楼西原有吕祖庵,亦称纯阳院,明万历年间谢淳重修,改名纯阳庵。又如海州、连云区白果树村等地亦均建有纯阳庵,便是情理中的事了。

二、宋代吕氏与海州

吕氏家族世代以诗书传家。自宋仁宗朝吕龟图任左谏议大夫、参知政事起,吕氏家族迅速崛起,成为政治世家,名门望族。吕蒙正仕真宗、仁宗两朝,三次出任宰相,吕夷简任仁宗朝宰相,吕公弼任仁宗相、吕公著神宗、哲宗朝三度为宰,可谓“一门三相”、“三世四人”为宰,且有许多思想家,文学家,教育家,活跃于南北两宋文坛政界,吕氏家族发展到了鼎盛阶段。

以笔者目前所掌握的资料所知,至少有三位吕氏家族达官显宦曾亲履海州山水,并留下印迹。

巧合的是,首先仕位海州的竟是另一位吕海州吕蒙巽。据《宋史》《嘉靖寿州志》等记载,吕蒙巽父亲为吕龟祥,太平兴国二年(977年)吕龟祥与其侄吕蒙正同年登进士及第,为殿中丞知寿州。生三子:蒙亨、蒙巽、蒙周,吕蒙巽为次子。据王珪《华阳集》卷五十三《寿安县太君吕氏墓志铭》:“海州之从兄宫师文穆公,太平兴国中策进士第一……与海州素相友爱……太尉文靖公,海州之兄子也,少时尝亲帅诸子弟厉志于学。”“父讳蒙巽,尚书虞部员外郎,知海州。”“海州”即吕蒙巽,知海州的时间为景祐三年至宝元三年(1036—1040年)。墓志铭中“太尉文靖公”即宋代著名政治家吕夷简。

第二位与海州有密切关系的是著名的东莱公

吕好问。吕好问(1064—1131年),字舜徒,吕公著之孙,吕希哲长子,靖康元年进士。吕公著(1018—1089年),元祐初拜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与司马光同心辅政。卒,封申国公,谥正献。著有正献公集二十卷,《文献通考》行于世。吕公著长子吕希哲(1039—1116年),世称茱阳先生。元祐中,以范祖禹荐为崇政殿说书。绍圣初,坐元祐党,贬为和州居住。徽宗立,召为光禄少卿,又遭崇宁党祸,夺职居淮、泗间,授徒讲学,学术大成,著有《吕氏杂记》等十数种。

崇宁(1102—1106年)初,吕好问以元祐党争子弟坐废。两监东岳庙,司扬州仪曹。钦宗时(1126年)任御史中丞,多次上疏议论时政,又因弹劾大臣懦弱误国而被贬,曾“奋笔益力,累疏蔡京之恶”,又抗书言蔡京余党不执行解党禁之令。金人迫近京城时,钦宗才启用他为兵部尚书。靖康之难后,金人立张邦昌,以好问为事务官。好问力劝张邦昌迎立赵构为帝。宋高宗即位后,曾称赞吕好问曰:“宗庙获全,卿之力也”,以恩封东莱郡侯。建炎元年(1127年)秋,吕好问出守宣州。次年秋,金兵南下,吕家辗转南逃,绍兴元年(1131年)七月,逃至桂林(今桂林),不久吕好问病重逝世,享年六十七岁。

煊赫的政治地位促进了吕氏家族学术声誉的传扬,从吕公著开始吕氏家族便在学界声名显赫。欧阳修出使契丹时,契丹主问及中国学行之士,欧阳修即以吕公著回答。吕希哲夺职居淮、泗间时,也是“学术大成,从学者众多。”吕祖谦《东莱集》卷14《东莱公家传》:好问“司扬州仪曹事,扬据南北冲,贤士大夫舟车上下必过公而拜茱阳公于堂,如杨侍郎时中立、陈右司瓘瑩中,每过扬与公语连日夜不厌,所言皆经世大畧。”“宣和之季,故老踵相蹶下世,独公与杨公中立无恙。诸儒为之语曰:‘南有杨中立,北有吕舜徒。’盖天下倚以任此道者,惟二公云”。与杨时并驾齐驱的地位,足以说明了吕好问的儒学成就。

然而,盛极必衰,在残酷的政治斗争中,以吕公著为代表的吕氏家族不可避免地卷入了宋朝最严重的新旧党争,即元祐党争中。熙宁元年(1068年)宋神宗即位,次年王安石推行新法,以稳健守成为宗旨的吕公著与司马光属于旧党,一起反对熙宁新



法,结果两败俱伤,屡遭打击,绍圣间遭到追贬。后吕希哲亦以崇宁党祸屡遭夺职,晚年居淮、泗间十余年。其子吕好问遭受牵连,以元祐子弟例不得至京师,两监东岳庙,客于宿州七年,后来复调真州春料船场,司扬州仪曹事,因不附蔡卞,“滞于故官”,“客颍昌之阳翟者又十二年”。新旧党争对宋神宗到高宗朝的政治产生了相当恶劣的影响,吕氏家族无疑也是新旧党争的受害者,家族成员屡遭贬黜,颠沛流离,经济上日见疲敝,严重阻碍了吕氏成员尤其是吕氏后人在仕途上的正常发展,昔日一门三三的盛事随着党争和吕氏南迁而逐步逝去。南宋以降,吕氏家族逐步由“官僚世家”向“文化世家”转化。吕好问长子吕本中诗文成就甚高,学术造诣颇深,为南宋初道学家、诗人、教育家,世称东莱先生。到吕祖谦时,集家学和诸家之长,首创“婺学”,别为一家。

原位于海州区锦屏镇岗嘴村岗嘴山顶,上世纪九十年代被整体迁移至桃花涧风景区的小姐洞,内壁上有一则题刻:“舜徒彦父同游。辛酉十月初六日”这里的“舜徒”即吕好问。同游者为扬州仪征人仇博,字彦父。吕好问来游海州之事不见记载,但根据其生卒年月,推知辛酉年为北宋神宗赵顼元丰四年(1081年),正是吕氏父子贬居淮、泗期间。题刻落款采用干支纪年,乖于常规,或许是吕好问慑于党争余波,低调内敛的一种精神表达。但无论如何,这则题刻都具有不同寻常的价值和意义。

第三位与海州关系密切的是吕嘉问。在吕氏家族普遍反对王安石变法的背景下,吕望之却坚定地站在了王安石一边,积极推行新法。

据《宋史》卷一百一十四《吕嘉问传》:吕嘉问,字望之,吕公著长兄公綽之孙,以荫入官。熙宁初,条例司引以为属,权户部判官,管诸司库务,行连灶法于酒坊,岁省薪钱十六万缗。支援王安石变法,熙宁五年(1072年)提举市易务三司使。不久,京师市易务改为都市易司,成为全国范围内的市易领导机构。吕嘉问为缓和京城物资供应紧张局面,“往湖南贩茶、陕西贩盐、两浙贩纱”,顶住旧党压力,“秉义率法,困而不渝”,颇见成效。熙宁七年(1074年)三月,因市易法自身缺陷、反对派诋毁及新党内部勾心斗角,吕嘉问因“坐不觉察杂买务多纳月息公罪,

杖六十”。不久,出知常州。哲宗亲政后曾被起用,不久又被贬黜知青州,后又知永兴军,徽宗时分司南京,光州居住,郢州安置,流漓颠沛十几年,郁郁不得志流连山水而卒,终年七十七岁。

吕望之与王安石之间的密切关系在王安石的许多诗词中也有体现,如《送吕望之》:“年华岂有尽,心赏亦无穷。”《招吕望之使君》:“纷纷易变浮云白,落落谁锺老柏青。尚有使君同好恶,想随秋水肯扬舲。”《与吕望之上东岭》:“何以况清明,朝阳丽秋水。微云会消散,岂久污尘滓。所怀在分衿,藉草泪如洗。”诗中流露出二人志同道合、相互支持、不畏阻力的坚毅情怀。但无论如何,作为党争的牺牲品,吕望之集“家贼”、“国贼”于一身,既是个人的悲剧,也是那个时代的悲剧,令人唏嘘。

海州孔望山龙洞外石壁上有一则吕望之题刻:“王华曜守东武,由朐山太守吕望之率王硕父、黄天倪观东海于龙兴山之乘槎亭,饮于仰止亭。元祐四年十二月四日。”元祐为宋哲宗年号,元祐四年为1089年,龙兴山即孔望山。吕嘉问任朐山太守不见载于正史,《嘉庆海州直隶州志》据孔望山吕望之题刻增补于《职官》门,这既是对正史的补充,也是对其生平的部分还原,足可令人欣慰。另,浙江湖州秀岩亦有吕嘉问题刻,曰:“吕嘉问望之、王瑛辉玉、李延嗣□长、彭汝霖君时、曾孝蕴处善、余仲□老,绍圣丁丑三月朔同游”可做旁证。

简而言之,虽然不能确定唐代吕让父子与宋代吕氏家族同出一系,但是,这并不影响他们共同在海州历史上挥洒的浓墨重彩。有唐一代,吕让、吕洞宾父子或以惠政彪炳史册,或以神异令人膜拜。两宋时期,吕蒙巽获赞吕海州美名,吕好问以儒学成就为海州山川增辉,吕望之以壮士断腕般的果敢推行改革。另据孔望山龙洞田升之题刻,宋徽宗政和元年,吕永甫担任推官。或许还有许多吕氏族人与海州结下了不解之缘,受制于史籍阙载,只能留下深深的遗憾。

(作者单位:连云港广播电视大学)

责任编辑 张伟敏



晚清淮盐白嫖

——兼论淮北盐区清末民初的发展

胡可明

发迹于春秋的淮盐,曾使春秋吴国很强盛。汉吴王刘濞也曾将淮盐作为觊觎皇权的经济支柱。中唐至两宋,淮盐一路前行,领先于全国。明至清中期,淮盐区一直居于全国盐业中心地位。清嘉道朝后,淮盐似乎跑累了,要稍息片刻般地疲惫了下来。但正是在这种半个多世纪的小息之后,猛地觉醒又向前走去。笔者把淮盐的晚清至民初的衰落而重振称作淮盐白嫖,意欲论证淮盐的巨大生命力,并以此文寻求指教。

淮南趋衰缘于盐法和自然的双恶

明至晚清前,是淮盐的鼎盛期。清乾隆朝淮盐达到了最高峰,年产盐高达 1050 万担(52.5 万吨),乾隆八年(1743)两淮盐课银四百余万两,占全国的半数以上。盛极而衰。封建王朝视淮盐为己物的专断态度及盐策,被淮盐兴旺刺激起来的括地以净式的官僚巧取豪夺,加重了淮盐的税赋负担。加之报效捐输为名的索取,终致淮盐疲惫不堪,随着清王朝的逐步衰败而渐趋衰落。至道光初年,淮南垄断的苏、徽、鄂、豫、湘、赣 6 省的 250 个州县的淮盐市场,几尽丧失。淮盐由于产旺销绌,积压极甚。至道光十年(1830)亏历年课银 5700 万两。道光十二年(1832)在淮北盐区实施废引改票盐法改

革,其后 14 年间,每年行销淮盐量是改革前的两倍,达 600 万引,纳课银 1100 万两。同时还替淮南完成销售定额,每年代纳盐税银 32 万两,另补贴淮南经费 40 万两。淮南也在道光朝的最后一年(1850),仿效淮北盐区实行票法,也立见大效。这一段淮盐史,可以理解成是淮盐白嫖的第一回,也是淮盐重振雄风的预演。

然好景不长。已如朽木不可再雕的晚清王朝越发腐败,有助于发展淮盐生产力的票盐法,至同治三年(1864)起,先后被曾国藩、李鸿章两任两江总督渐次篡改,复行旧盐法——明朝万历年间流传下来的纲盐法,淮盐再逆转为厄运,每况愈下。盐法被颠覆,对淮盐无异于当头一棒。如果说这已使淮盐外伤累累,那么淮南盐区自然条件恶化,不利于再兴盐业,则是其内伤了。清朝后期,海势逐步东移,淮南盐区海水趋淡,海盐产出率日趋下降。而淮南向为煎盐,海水趋淡严重,盐析出率愈来愈低,耗费的煎盐柴草越来越多,出盐周期也越发见长,自然其工本远大于实行晒制的淮北盐。鉴于淮南盐区自然条件已不适合于再煎海盐,故而才有民国三年二月,盐务署曾令通泰两属盐场限产,年递减 2 成,5 年终产(见林振翰著《淮盐纪要》)。





林振翰著《淮鹽紀要》(民国十七年十月初版)

淮北崛起成于规模和技术之双助

一些历史事件发生都有预兆性。恰在两淮盐最鼎盛的清乾隆朝二十八年(1764),两淮盐运司三分司之一的淮安分司北移海州称海州分司(驻海州板浦镇)。虽然雍乾嘉三朝近百年中早为淮盐衰败埋下了潜因,但终究是在100年后的光绪朝末期才致淮南盐一蹶不振的。清光绪三十三年(1908),由两江总督端方拨借库银,令淮北垣(场)商在丰乐镇(今灌云县洋桥镇)西增铺盐滩40份,名济南盐场,场治板浦,以产之盐接济淮南所欠盐量(后该盐滩废弃)。据《江苏省志·盐业志》,其后几年,淮北盐区兴起铺设新盐滩热潮。从光绪三十四年(1908)至民国三年(1914)7年间,淮北又新建设145条圩子,新建盐滩1160份,先后成立大德、大阜、大有晋、大源、公济、裕通、庆日新7个制盐公司,定名为济南盐场。其时淮北盐区的济南、中正、板浦、临兴四场,合计有盐滩3114份。济南盐场建成达产后,年产盐13.54万吨,以其一场产量超过淮南整个盐区的总产量,而居淮北总产量7成以上,号称“淮北第一巨擘”。

《淮盐纪要》载:民国十一年至十五年(1922-1926),淮北盐产达7827853担(391392.65吨)。《中国盐政史》载:民国二十年至二十四年(1931-1935),淮北盐产8495000担(424750吨)。其中民国二十二年(1933)淮北年产盐900万担(450000吨),占全国盐量18%。淮北盐工本也是远低于淮南盐区的。《中国盐业史》统计资料显示:1929年两淮除济南场外,淮北晒盐成本

为每担0.338元,淮南煎盐成本每担在1-2元之间,晒盐区偏高的济南场每担1.535元,亦低于淮南平均成本。到1935年,全淮北平均每担成本0.4元,淮南仍居高不下。此外,据《中国实业志》,民国期间淮北圩盐氯化钠含纯89.29%、水份6.1%、夹杂物4.61%,淮南盐则分别为87.9%、6.73%、5.37%,淮北盐质明显高于淮南。

是时,两淮盐运司已于两年前由扬州移驻淮北(今之灌云县板浦镇),扬州改设淮南运副,专事淮南盐务。此亦标示出两淮盐区北重南轻。

济南盐场的建成并达产,可以说是淮北盐区清末民初的一个大事件,犹如一匹黑马在云台山下的黄海之滨冲出,一个亮相就使减产的淮盐重新振奋了起来。淮北一以贯之晒式产盐,且济南场的建成生产规模扩大产量猛增,又因仿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较先进的管理方式,使淮北盐得力于规模与技术的两相助力,犹如腾飞之双翼,在国家盐策发生变化时能从容应对。据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经济史研究室编著的《中国近代盐务史资料选辑》第1卷,民国三年(1914)取消了淮北票权,从而开放了淮北票盐皖、豫引地及行销淮盐的安徽宿、渦2县。民国四年(1915)开放了淮鲁并销的山东临沂6岸。民国五年(1916)开放了淮北近场5岸(江苏省沐阳、涟水、东海、赣榆、灌云)及徐淮6岸(包括江苏淮安府属之山阳、清河、桃源、与徐州府属之宿迁、睢宁、邳州)。这种改革还是比较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高质量、低成本食盐可以在竞争中处优,也使吃盐人减少吃盐支出。如此,理所当然地也促进了晒式低成本的淮北盐的发展,同时促成了煎式高成本的淮南盐的进一步减量萎缩,而使整个淮盐重心加速北移。

淮盐自擅功于欲求和措施之双联

清末民初淮盐成功地进行了淮北淮南间的内部调整,实现了华丽转身,是政府、社会、盐商、灶户、销区共同作用的结果。简言之,是生产者、管理者、市场三力合成的结果。民以食为天,食不可一日无盐。淮盐质量好,行销范围广大,别说两淮盐都停



供,仅淮南停供,就要有不知多少人口面临淡食之虞。这是一。淮盐量大,特别是淮北盐工本低,利润率高,有学者著文称达 40—50%,盐商们主观上不会轻易放弃经营淮盐。这是二。盐税向来是历朝历代政府仅次于田赋的第二大财源,清末民初官府拨借国库银又划出地亩在淮北开发新盐场,真正动机莫不如是。所以,官府不会任由淮盐大旗倒下的。这是三。再看两淮盐区的产盐人。淮北灶丁特别是济南场灶丁,在雇佣劳动制下,只领灶粮和少量的“担头费”,盐产丰欠与切身利益相联。销岸如何、课银高低似乎都与己无关,有一种低级的、无可奈何的适应感,至少说不会成为淮盐发展的阻碍者、破坏者。这是四。仅如上四个不同阶层对淮盐的欲望,就构成了淮盐适自然规律和历史趋势而动的内在动因和外在条件。

淮盐区内部在淮南淮北之间重心位置的置换及主次角色的更替成功,还在于淮北集、运盐斤的模式出新及新式运输工具的采用。民国三年(1914)后,淮盐市场逐步放开,竞争随之而至。为满足销区需要,快捷发运,尽快使盐运到销区投入市场,淮北盐区在原板浦、中正、临兴三场建立(局)仓垣基础上,新建的济南场七公司,储存盐斤方式以圩为单位建廩分散堆存,廩之大小有数千担至 2—3 万担不等。民国五年(1916),济南场公济公司投资 8 万元,在灌云县燕尾港建成储盐量 100 万担的坨地和出海木质码头一座。民国十八年(1929)又改造为钢筋混凝土结构,称“公济码头”。公济码头建成使用,使济南场盐斤通过圩河而出海而转内河运达销区,提高了运输速率。从此,淮北盐区在建圩铺滩热潮五年后,又大兴建坨建码头热潮。民国七年(1918),济南场大源、裕通、庆日新三公司先后分别出资 4 万元、3.4 万元、3.9 万元,在响水县陈家港建立盐坨和码头,总储量达 425 万担。民国八年(1919),由大德、大阜、大有晋三公司合资 3.8 万元,在堆沟建立盐坨,储盐量 252 万担,同时建 46.45 米出盐码头,谓之“德阜晋码头,搭船栈桥全长 85.05 米,为木质、混凝土混合结构。民国十四年(1925),大有晋公司又投资在灌河南小蟒牛另建一辅助坨地,储盐量 24.5 万担。同年,储盐量 200 万担的徐圩坨、100 万担的张圩坨、60 万担

的三洋港坨、200 万担的东隰山坨相继建成投入使用。民国十五年(1926)建立了大浦坨地和码头。据国民政府盐务署出版的《盐政实录》载:“大浦坨建筑使用,淮盐外销每年达 219600 吨,超过建坨前 5 年(1921—1925)销售总量 15 万吨的 68.18%”。大浦坨地和码头的重要作用,引起了国民党政府的高度重视,民国二十一年(1932)九月七日,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长兼财政部长宋子文在盐务署长朱廷祺陪同下,乘专机到淮北盐区视察,决定由财政部拨款 140 万元,用于建坨和疏浚河道等工程,从而又促进了陈家港坨、燕尾港坨、头罾坨、猴嘴坨的新建、翻建和扩建。特别是猴嘴坨地和码头,于民国二十二年(1933)建成,储盐量 150 万担,筑吊桥一座、水门一座、三层炮楼两座,用于盐斤保护。铺设专用小铁路两条用于圩廩存盐集运入坨。同时疏通了猴嘴坨地至中正、板浦两场驳盐干河 58 公里和板浦场区支河 72 公里。民国二十四年至二十六年(1935—1937),猴嘴盐坨铺设全长 2423 米双股铁路专用线,连接陇海铁路。与此同时,淮北盐区的晒盐滩式结构也在摸索中改进和创新。史料可查知的有淮北区沙帽翅式盐田、淮北区怀中抱子式盐田、淮北区盘香转式盐田、淮北区珍珠卷帘式盐田、淮北区双电灯式盐田、淮北区八卦式盐田、淮北区圩式池滩八份双晒式盐田、淮北区大浦新式盐田等。这些生产力元素的提高和进步,无疑都确保了当时新生的济南盐场的稳固存在和生产增长,也就推动了淮北盐区的成长,巩固了古老淮盐的历史地位。

淮盐区自嬗成功的最有价值的历史意义还在于,济南场的东部后来成为了盐城地区盐业的主干,西部则成为了今之连云港地区盐业主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两个城市无论是清末民初,抑或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的几十年中,经济总量因淮盐而保持了一个较高的水平。特别是连云港市地区,清末民初包括新浦在内的城镇建设、蔷薇河在内的河道建设、东陇海铁路建设、连云港港口建设等,都受到淮盐极大的催生和拉动。

(作者单位:连云港淮盐文化研究会)

责任编辑 邱仕明



百年新浦照相业

韩世泳

据《新浦区志》记载,新浦自民国五年(1916年)开始出现第一家照相馆,照相业兴起,至今已近百年。百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新浦照相业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一)

作为地域概念的新浦,原居盐河(古称“官河”)和蔷薇河之入海口处,海河运输方便,又紧靠古城海州。这种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给这个新生的小港口带来了勃勃生机,一些有眼力的商人,看准这块风水宝地。他们通过水路将两河上游沿岸的粮食、土特产运到此出售,相互交易。很快这儿便从一个小渔港和盐的集散码头,发展为南北物资交易港埠,商气建成,人烟渐稠,商气人气相互带动。行商、坐商及劳苦大众,各自择地安营扎寨,居民和各种货栈渐多。清光绪十八年(1892年),来自其西北不远处海州富安的刘氏家族中开明商人刘振家、刘振鼎等,审时度势,倡修新浦天后宫,历时10年,全部竣工,香火旺盛,新浦工商各业与日俱兴,大街初成(今民主中路市民路至南极路段)。继之,海州沈云沛、赣榆许鼎霖等实业家也来此兴办半机械化的槽坊、油坊、面粉工商、油饼公司,更增添了新浦的时代气息,遂成就兴商埠,为苏北、鲁南一带物资集散地。随之,南北客商所带来的时尚消费,也渐为新浦、海州的一些工商界人士、富户和一些青年所接受。加之,陇海铁路东段至海州的方案已定,商人对这块商机无限之地更加青睐,便从四面八方来到此地,投资兴办时尚商业服务业,新浦照相业的开创者夏少明就是其中之一。

夏少明,安徽人。民国五年(1916年)来到新浦,在紧挨大街的新市街南侧(今第一池斜对面)租房开设照相馆,起名“夏昶兴照相馆”,开新浦乃至海属地区照相业之先河。像所有先进的东西不是一下子就能被所有人接纳一样,特别是在民国初年,在我们这偏僻的苏北地区,封建迷信思想相当严重,“照相会被摄走魂灵”之说尚有人信,照相业务很难一时兴旺。夏少明深知此情,不急于求成,而是顺应人们烧香拜佛之需求,先以拍摄一些佛像的照片出售为主,让人们慢慢对照相有所了解。同时,积极向与他接触的人们宣讲照相知识。遇有对此爱好的人,他更是毫无保留地传授照相技术,收徒弟培养照相人才。就这样水到渠成,照相业务日渐兴旺。不久,迁址大街东段,生意越做越好。

夏昶兴照相馆在新浦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吸引了更多同行人的目光。民国十七年(1928年)后,新浦大街第一次脱胎换骨,沿街草屋店铺先后推倒重建为砖石墙、瓦屋面的两层楼房的商业街,工商生意红火,扬州人居肯、丁实之、刘松如等相继来新浦开了摩登、振雅轩和新时代照相馆,新浦一下子有了四家照相馆,照相初成行业。

不过,那时新浦各照相馆的设备都很简陋。照相机多是皮老虎相机,支在木质三角架上。那时,新浦虽然有了新东电灯股份有限公司,但照明设备跟不上,各照相馆依旧只能在屋面上设置玻璃天窗,“借用”日光照相,亮度不够,再在适当位置点盏汽油灯,以作辅光。若遇到阴雨天,就无法照相。各家照相用的底板,全是玻璃干片,面积较大,一块干片



底板上可以安排若干不同尺寸的照片,也只有一块底板都照满了,才能在暗房冲底板、印洗照片。照一张照片,快的也得六七天才能拿到相片。当时,在新浦几家照相馆中,要数居肯所开的摩登照相设备较好,个人照、团体照都能照。特别是居肯善于拍摄艺术照片,更受青年欢迎,营业情况当然也数他家最好。

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日本侵略军侵占新浦后,日商松井宗光在中山路东段(今民主中路市民路至龙尾桥段)开设中央照相馆。并有日商在此开办日华兴业、桥吉洋行和宫本商店等专营照相器材批发、零售、业务的商店,强占新浦照相市场。加之日商照相馆设备先进,国人所开照相馆受到很大冲击,有的难谋生计。

面对日商的侵略行径,国人照相同仁为了生存,也克服困难,添置新设备,促使新浦照相业的设备更新。在此期间,各家所用照相底板开始由玻璃干片改为软底片;添置放大器材,开展放大业务,并根据顾客需要,开始对艺术照片进行人工着色。1941年8月,海州人胡敬同将其在海州城开的“同华照相馆”迁来新浦,设于王巷西首,同时改称“苏北照相馆”,并在院内建一玻璃屋,备有风光布景。胡师傅十分讲究照相艺术,注重为顾客拍摄具有较

高欣赏价值的艺术照片,很快就在新浦小有名气。1943年,扬州人陆景椿来新浦,在海昌里开了家“富美照相馆”,以齐全的设备 and 较精的摄影技术很快在新浦商业黄金地段打开局面,并与“苏北照相馆”一东一西成为新浦知名照相馆。

抗战胜利后的第二年,“苏北照相馆”迁至中山路教育巷1号(现新浦区政府西首),更名为“真善美摄影社”,生意更红火,名噪一时。这时,新浦各照相馆也开始使用软底片,照相质量有所提高。可是,好景不长,由于国民党发动内战,派捐派税,通货膨胀,民不聊生,直至解放前夕,新浦12家照相馆都生意惨淡。

(二)

新中国成立后,新浦的私营照相馆绝大部分照常营业,以“真善美摄影社”生意最好。20世纪50年代初,该摄影社还一度到赣榆、日照、郯城、临沂一带开设分店(当时,新海连市属山东省临沂地区)。50年代中期,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中,新浦的照相业走上公司合营之路,由“富美”、“真善美”、“新明”(原摩登照相馆)、“新美”(原名夏昶兴)、“爱华”5家成立公私合营“新浦照相馆”,分设富美、真善美、新明3个门市部,归市商业局统一管理。在当时全市胜利度过三年国民经济

恢复期,并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大好形势下,新浦照相业也得到了发展。1958年,各照相馆开始使用灯光照相,结束几十年的依靠日光照相的历史。同时,其他照相设备也开始得到改善,生活照、艺术照渐渐普及。

但是,时间不长,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文化大革命”,先是“破四旧,立四新”,照带有生活气息的生活照、艺术照,甚至照片上色,抹红腮、红嘴唇等,都被视为资产阶级思想作风的“旧思想”“旧作风”,都属要“破”之列,照相馆的生意一下子就跌落下来。“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后,由于“两派”之争、“武斗”不断,新浦很长一段时间工厂停工、学校停课,照相业近乎停滞。

(三)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特别是改



富美照相馆

革开放后,随着社会发展,百姓生活水平提高,人们爱美之天性得以舒展,新浦的照相业以前所未有速度实现了由量的发展到质的变化的跨越发展。

由黑白照相时代进入彩色照相时代

1978年冬,市饮食服务公司的冬梅照相馆(坐落于南极北路,新浦公园对面)率先引进先进设备,开始使用了影像合成联合控制器和放大自动对焦新工艺,照相质量大为提高。

1980年,冬梅照相馆添置彩色照相设备,率先在新浦乃至港城开展彩色照相业务。不久,海燕照相馆(原名“富美”)、曙光照相馆也相继开展彩照业务。自此,新浦照相业由沿袭60余年的黑白照相时代跨入了彩色照相时代。

1984年,华侨陈某与市政府第一招待所洽谈,由陈某投资进口麦士彩扩机设备,由市一招出门面房的办法,在市一招北墙外(市化路南侧)开设全市第一家合资照相企业——云侨彩色照相馆,开了新浦彩色扩印之先河。1985年,市饮食服务公司投入60万元,购进富士迷你27分钟彩扩机1台,安装于解放中路上的曙光照相馆,并同时将照相馆更名为“连云港市彩色照相扩印中心”。1988年,海燕照相馆贷款10万元,添置国产彩扩机1台。1990年,该照相馆又添置1台进口的科宝6030彩扩机。此后,随着傻瓜照相机的普及,新浦从事彩色照相、彩色扩印的照相企业越来越多。到2005年,新浦大小照相馆已达85家。此时,黑白照相已全部退出市场。

彩照放大由手工制作进入自动化时代

新浦照相业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正式进入彩色照相时代,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彩色照片放大全靠手工制作,对照片质量有一定影响。一些大规格的彩色照片还必须到外地放大,顾客不能及时拿到照片,使照相业务受到一定制约。1999年新中国成立50周年,市有关部门计划举办大型摄影展。为了承揽这次大型摄影展的照片制作业务,民营“敦煌照相馆”投入120万元,购置1台自动裁放机,实现了彩色照片放大自动化,结束了新浦地区大规格彩色照片要到外地放大的历史。

照相由使用胶片进入数码化时代

20世纪90年代起,数码照片开始为新浦地区广大摄影爱好者青睐。为适应广大数码相机持有者

打印、放大数码照片的市场需求,2003年5月,敦煌照相馆投入150万元购置港城第一台魔术手数码激光扩印机,并安装成功,投入使用。摄影者以磁卡即可到此扩印或放大各种规格的彩色照片。此后,新浦各大照相企业先后添置了这种激光数码扩印设备,方便了顾客。过去,顾客到照相馆照照片,最快也得七八天才能拿到相片。如今,遇有急需,随时就可到附近照相馆扩印,稍等片刻即可拿到照片。

个体私营照相馆成为照相业主体

随着港城改革不断深化,开放不断扩大,新浦地区照相行业的经济体制发生了巨大变化。自1984年,新浦出现第一家合资照相企业——云侨照相馆后,新浦先后出现了武汉、南京等地人开设的私人经营照相馆。1990年10月,出生于照相世家的胡奇,从海燕照相馆“下海”,自筹资金20万元购置彩照设备,在新浦海连中路原交通旅社西首租房开设敦煌摄影公司,兼营照相器材。随后,原市彩扩中心的时宽友“下海”,在通灌路开设宽友影社。1995年春,市饮服公司业务科长冯久雨“停薪留职”“下海”,租用市化路上的海昌楼下一间门面房,与时宽友、房卫红等,每人出资5万元,合资开办天成照相馆,开展彩扩业务。同年春,沐阳人李武、张素侠来新浦海昌北路(市体育馆东大门对面)租一间10平方米的门面房,开设“台湾三毛照相馆”,初以135相机从事黑白和彩色照相,1997年迁址于海昌路铁道口东北首一70平方米门面房内,开展婚纱摄影,同时更名为“大花轿”,自购面包车接送顾客到景区或海边拍摄婚纱照片,生意越做越好(2002年迁至海昌北路与新生民路交叉口现址)。1998年8月8日,冯久雨自营的“上海维纳斯连云港店”在海昌北路88号开业,成为港城人自己开的第一家婚纱摄影店。

自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起,新浦地区的个体私营照相馆如雨后春笋,出现于新浦大街小巷和乡镇驻地。据有关资料,至2012年底,新浦地区个体私营照相馆已近百家。

(作者单位:新浦区地志办)

责任编辑 邱仕明



连云港红色地名

王 滨

中国地域名称来源丰富多样,人的名字也是地域名称的来源之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及根据地政府学习参照苏联的模式曾经广泛用烈士名字来命名根据地地名。1949年3月,中共中央召开七届二中全会。在这次会议上,党中央作出了“不祝寿、不送礼、不以领导人名字命名地名”等重要规定,之后各地根据实际情况或保留或取消了以英烈名字命名的地名。

时至今日,中国这个泱泱大国以人的名字命名的城市屈指可数。广东省的中山市(孙中山)是中国唯一一个以人名命名的地级城市。县一级的有七个:分别是陕西省的子洲县(李子洲)、志丹县(刘志丹)、子长县(谢子长),山西省的左权县,河北省的黄骅县,黑龙江省的尚志市(赵尚志),吉林省的靖宇县(杨靖宇)。再下一级比较有名的包括山西省文水县的刘胡兰镇,福建省闽侯县祥谦镇(林祥谦),江苏省滨海县正红乡(顾正红),泰兴县根思乡(杨根思),湖南望城县的雷锋镇,桂阳县欧阳海乡(欧阳海)。

连云港地区属于革命老区,因而在革命战争年代也产生了许多用英烈名字命名的地名,有些名字至今还在沿用。

竹庭县(今赣榆县)。江苏省境内在革命战争年代一共出现了三个以人名命名的县,分别是叶挺县(今盐城市)、紫石县(今海安县)和竹庭县(今赣榆县)。竹庭县是我市唯一一个以英烈名字命名的县

级行政单位,是为纪念在赣榆牺牲的符竹庭将军而命名。符竹庭(1912-1943),江西省广昌县人。抗日战争时期,在滨海地区坚持对敌作战,亲自组织和指挥了青口战役,为滨海抗日根据地的建立与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1941年7月7日,符竹庭亲自踏勘选定赣榆县西部马鞍山动工兴建抗日烈士纪念馆,抗日山烈士陵园成为国内建园时间最早,规模最大的抗日烈士陵园。1943年,符竹庭担任中共滨海区党委书记、滨海军区政委。1943年1月,率部攻克鲁南重镇郯城,首创山东部队攻取县城范例。11月,以政治攻势与军事打击相结合的高超战术,智取赣榆县城,一举歼灭日伪军2000多人,而我军仅牺牲3人,负伤37人,以极小的代价换取了极大的胜利。符竹庭将军军政双优,战功卓著,所创青口战役、海陵反“蚕食”、三打甲子山、郯城战役、赣榆战役等成功战例,先后载入《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大事纪要》。1943年11月26日凌晨,在反“扫荡”斗争中,符竹庭将军不幸以身殉国,壮烈牺牲在赣榆县吴山区马家旦头村,遗体葬抗日山烈士陵园。1945年12月26日,经山东省政府批准,滨海区行政公署将赣榆县命名为竹庭县。1950年10月,为响应中央有关决定,恢复赣榆县的县名。

除竹庭县之外,我市境内还陆续产生了许多以烈士命名的地名。

赣榆县镇南区,以烈士孙敏命名。孙敏(字镇



南,1918~1941),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担任抗日民主政府三区副区长。1941年2月,在突围战斗中壮烈牺牲。之后抗日民主政府将三区命名为镇南区。

东海县清怀乡,以烈士吴清怀名字命名。吴清怀(1922~1947),东海县双店镇昌沂村人。194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民政助理、副区长等职务。1947年2月被叛徒杀害。其牺牲所在地牛横沟被更名为清怀乡。

灌云朱环乡,以烈士朱环名字命名。朱环(1925~1943),灌云县侍庄乡朱埝村人。1943年年底,深入敌人据点内执行任务时被捕牺牲。朱环是连云港市抗日先烈中最年轻的一位共产党员。1946年,中共灌云县委、县政府将朱埝改为朱环乡,并在他的家乡建立了朱环小学以示纪念。

灌云县萱凤村,以烈士李培萱、杨凤名字命名。李培萱(1916~1948)、杨凤(1928~1948),灌云县侍庄乡沂北村大福寿庄人。1948年5月,国民党第44师500多人偷袭我大福寿庄,副乡长李培萱和乡妇救会会长杨凤等24人在战斗中壮烈牺牲。解放后,人民政府为纪念大福寿战斗的英烈们,特以李培萱、杨凤的名字将福寿村命名为“萱凤村”。

灌南县苏光乡,以烈士苏光名字命名。苏光(1919~1946),原名陈德芳。灌云县板浦镇人。194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生前任中共灌云县政府秘书兼党支部书记。1946年9月27日,在外出执行任务返回途中遇袭牺牲。其牺牲所在地被命名为苏光乡,解放后改称苏光公社。1960年改回田楼公社(乡)。

灌南县曙红乡,以烈士汤曙红名字命名。汤曙红(1915~1939),灌南县汤沟镇人。抗战初期,海属地区抗战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八路军山东纵队陇海南进游击支队第三团团团长。1939年7月被国民党沭阳县常备队小队队长周法乾等人阴谋杀害。1940年8月,抗日民主政府改汤沟乡为曙红乡,改汤沟小学为曙红小学。1945年,灌云县设置曙红区。后为曙红公社。1960年,曙红公社更名为白皂公社。

灌南县锡恩区,以烈士陈锡恩名字命名。陈锡恩(1919~1945),涟水县人。1939年参加革命并

加入中国共产党。1943年任宴庙区区长。1945年在战斗中不幸牺牲。为纪念陈锡恩,宴庙区被更名为锡恩区(1954年撤销锡恩区,并入百禄区)。

以上地名在后来因各种原因先后取消,但仍有部分以英烈命名的地名至今仍旧沿用,主要的有:

东海县王烈村,以烈士王家林等名字命名。王家林(1923~1946),江苏省涟水县人。1946年4月,时任猫奔乡(今东海平明镇王烈村)乡长王家林在乡公所商讨工作时被国民党军队包围,战斗中王家林和几个乡公所的干部全部牺牲。解放后,为纪念王家林等革命烈士,其牺牲所在地被改名为王烈村。

灌云县隆昌村,以烈士潘隆昌名字命名。潘隆昌(1911~1943),灌云县南岗乡人。生前任新四军四师团作战参谋。1943年6月在安徽省灵璧县指挥作战时不幸牺牲。1949年,灌云县将他的家乡命名为隆昌乡,现为“隆昌村”。

灌云县树云村,以烈士任树云名字命名。任树云(1916~1947),灌云县侍庄乡树云村人(原任庄村)。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生前任中共伊山区委副书记。1947年2月,在掩护群众转移的战斗中被俘牺牲。1949年,其出生地徒北乡被命名为树云乡,现为树云村。并建立中学命名为树云中学。

海州区德芳居委会,以烈士苏光名字命名(苏光原名陈德芳)。苏光牺牲后,其牺牲所在地被命名为苏光乡,其出生地被命名为德芳居委会。

在大建设、大拆迁、城镇化发展不断加速的时代,地名也在不断变化中,我们可否考虑在不影响建设的同时保留红色的地名,以传扬爱国主义教育。

(作者单位:市委党史工办)

责任编辑 张伟敏

